

上  
運命之中國

著等達伯陳

行印店書華新北華

陳伯達等著

評『中國之命運』

華北新華書店印行

一九四九年二月

573.07  
526  
(385)=2

# 目次

評『中國之命運』	陳伯達	1
誰革命？革誰的命？	范文瀾	1
『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	艾思奇	27
駁蔣介石的文化觀	齊燕銘	1

# 評「中國之命運」

陳伯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還未出版的時候，重慶官方刊物即傳出一個消息：該書是由陶希聖擔任校對的。許多人都覺得奇怪：蔣先生既是國民黨的總裁，爲什麼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南京漢奸羣衆日鼓吹法西斯的、反對同盟國、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在精衛千絲萬縷地糾合在一起的臭名遠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難道國民黨中真的如此無人嗎？「中國之命運」出版後，陶希聖又寫了一篇歌頌此書的文章，由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這又使得許多人奇怪：爲什麼中央周刊這樣器重陶希聖的文章，難道蔣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聖的文章去傳佈不成嗎？總之，所有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們的驚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中國之命運」既是以蔣介石先生的名義出版的，就因蔣先生的關係，引起了人們的注意。當此抗戰處在重要關頭的時候，大家想蔣先生在這個時候出版這本東西，應該是對於如何準備對敵反攻，配合盟國作戰，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重要問題，有所指陳。因爲盡人皆知：今日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是抗戰，而不是其他。但大家讀到「中國之命運」後却不免大失所望，原因是那書中所提出的問題，和人們所期望的那相反，而且關於抗戰問題，在全書三十三頁當中，只佔了十二頁半。全書的中心是談內政問題。一言蔽之，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實際上主張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或新專制主義（雖然形式上仍戴着「三民主義」的帽子），因此使人們大失所望。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素來鄙薄那種掩蓋自己政見的人，蔣先生並不掩蓋自己的政見。在這一點上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共產黨人對於蔣介石先生此書是不同意的，我們既有不同意見，我們就有責任把自己的意見公開出來，以求國人之審察。蔣先生也說過：如有人對國共黨的「行動或態度有什麼錯誤，那你就應該來糾正他，來補救他」，那末，好吧，我們就提出意見來和作者及讀者商討，這應該是完全必要的事。因為蔣先生此書所討論的，是關係於中國之命運，關係於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故不但每個共產黨員應該十分注意，絕對不能忽視，而且是每個中國愛國人民都應十分注意，絕對不能忽視的。近日國民黨方面竟在圖謀「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中國國民黨指導的中央通訊社業已公開發布了這個消息，可謂到了怪論百出的時期，我們共產黨人自然不能默爾而息。但這種怪論是有根據的，只要一讀「中國之命運」就可找到這種根據，因此使我們更加不能默爾而息。本文所批評的，限於書中的幾個根本觀點。至於書中的其他觀點以及對於許多觀點的詳盡批判，只好俟諸另文及別的同志的著作。作者及讀者乃至任何愛國人民如果對本文有不同意見，我們希望提出辯論。真理是不怕辯論的，怕辯論的就不是真理。無數的國民黨刊物對於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批評得一塌糊塗，我們至今還沒有回答；現在就以蔣先生此書為契機，發表我們共產黨人的意見吧。

## (一) 關於中華民族

蔣先生此書對於中華民族的了解，和本來的歷史真實情況完全不相符合。此書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民族血統論，本來是德、意、日法西斯

義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就是拿這種怪論去作爲進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蔣先生也以血統立論，實屬怪事。這類怪論，決不能解釋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平日我們習用的所謂「中華民族」，事實上是指中華諸民族（或各民族）。我們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這本來是不用多辯的。清朝末年，孫中山先生和同盟會革命黨人的反滿運動，就是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舉行的。而且孫中山先生手訂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就明明白白寫過：「中國境內各民族」。否認這種見解，等於否認孫中山先生及其主義。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却別開生面，承認中國只有一個民族，這是很可駭怪的意見。按照作者的見解，則孫中山先生稱辛亥革命爲民族革命，這不是無的放矢嗎？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要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這又不是無的放矢嗎？蔣先生的意見，不明明是和孫先生的意見相違背嗎？

我們請研究一下：漢族和藏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藏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西來的回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苗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獯鬻和夷人又都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出自何經？據於何典？這是從那裏考證出來的？作者引了詩經「文王孫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難道現在中國諸民族都是文王的孫子嗎？凡此都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常識，並不需要什麼高深學問才能理解的問題，作者違背了這點常識，故弄得毫無是處。在此問題上，作者還提出所謂「婚姻的繫屬」，但是我們也請研究一下：難道漢朝王昭君出塞（不要忘記呀，這段歷史曾經是漢民族統治者向匈奴民族統治者送美女委曲求全的一段悲劇）就使得匈奴變成了漢民族的「宗支」嗎？難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即今之西藏），就使得藏族變成了漢民族的「宗支」嗎？若然，則近代許多中國人（其中包括現在國民黨的某

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華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嗎？

把中國國內各民族做那種解釋，則全部中國歷史都變成一堆不可了解的糊塗賬。如果照那種解釋，則漢時代漢民族和匈奴的戰爭，就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或者說是夫小姓的衝突吧）。五胡亂華、南北朝時代漢民族與各民族間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唐時代漢民族和回紇、吐蕃、沙陀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五代時漢民族和契丹的戰爭，宋時代漢民族和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明時代漢民族和蒙古、滿洲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太平天國和同盟會反滿的戰爭，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若然，則岳飛、文天祥、陸秀深、朱元璋、徐達、袁崇煥、史可法、鄭成功、李定國、洪秀全、李秀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以及孫中山先生……這一切在漢民族史上可歌可泣，而為漢民族和中國河山生色的歷史人物，不就都成爲一批毫無意義而死去的愚夫愚婦嗎？而石敬瑭、張邦昌、劉豫、秦檜、洪承疇、曾國藩、張勳……這一切萬惡不赦的漢奸，不又大可以「登廟堂之上」，而「受俎豆於千秋」嗎？按照作者關於民族的解釋和歷史的渲染，則全部中國歷史，必須完全推翻，而我們民族也寄托於烏有。

蔣先生說：「至於各宗族歷史上共同的命運之造成，則由於我們固有的德性，足以維繫各宗族內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德性。」我們也請研究一下：根據前面所列舉的史實，我們歷史上的民族鬥爭，曾經那麼殘酷，那麼無情。如果現在按照作者所說，那又將作何解釋呢？是的，歷史上漢民族在反對異民族侵入的時候，是有兩種人的根本分別的，一種人是廣大民衆，他們流血犧牲，抗拒外侮，是保衛祖國與光復舊物的基本動力；另一種人則是一些腐敗的統治者，他們在異民族侵入面前，

時常採取「寧贈友邦，勿予家奴」的政策，甚至以「天子之尊」向異民族的侵略者稱臣、稱子、稱姪、稱孫，而每年貢納很多銀帛、殺戮抗戰的大將，以求取得其寵幸（最好請看五代和宋朝的歷史吧）。這些皇帝和臣宰們時常拿出什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這些法寶來駕馭人民，大概他們對於異族侵略者的這種行徑，也就是實行了他們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德性吧。但是，這些行徑，對於我們民族，又有什麼值得誇耀呢？

照科學的了解，民族的特徵是：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經濟的聯系性）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結構。民族的鬭爭是社會分化為階級後的歷史結果，民族的鬭爭不是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也不會永遠要存在。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戰爭，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是「爲人類的永久和平而戰」。不僅如此，在人類大同還沒有實現以前，某些本來曾經是互相鬭爭的民族，但由於具體的歷史條件，也竟可能同化起來，變成一個民族，比如：中國以前入居中原的許多民族，都在中原和漢民族同化了。今天，滿民族在事實上也已同化於漢民族了。但這決不是由於什麼漢民族的「固有德性」，而是由於他們在內地和漢民族混居，漢民族在經濟上、在文化上、後來並且在政治上，都比較他們先進，比較他們佔優勢，而在人口數量上也較優越，這樣就在長期的殘酷鬭爭中逐漸地同化起來了。

現在是科學昌明的世界，民族歷史必須按照科學去解釋。法西斯主義曲解民族歷史、削改民族歷史、捏造民族歷史的伎倆，決不足爲訓。如果拿這種東西作爲國民的教本，就會愚弄國民。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所以要捏造這種單一民族論，其目的就在於提倡大漢族主義，欺壓國內弱小民族。我們漢民族本來也是一個很弱的民族，正應和國內一切弱小民族進行平等的民主的聯合，才能共同抵抗侵略者。如果我們一方面抵抗侵略者，另一方面又要拿大漢族主義去欺壓國內其他弱小民族，那就會給

敵人利用的空隙，而不利於我們民族解放的事業。這是每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所應該注意的。

中國和外國的一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總是盜竊「民族」為私有，好像民族即朕，朕即民族，請研究一下：民族是由什麼人組成的呢？我們這民族的絕對大多數不是工農群眾嗎？如果沒有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動民衆，我們民族從何處得到衣食住，從何處組成抗戰的軍隊，又從何處有文化？工人農民不正是民族的主體嗎？不正是他們的利益才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嗎？不正是他們才真正配得代表民族的名義嗎？而其他的人，反對工農大眾的人，却自稱是民族的代表者，不就是一種竊盜嗎？既然勞苦大眾是民族的主體，那末，只有勞動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不是很明顯的道理嗎？把勞動人民看成至下，這不就是把民族看成至下，把國家看成至下嗎？

誰是民族的主體？答覆這個問題，才解釋得了民族這個問題，才解釋得了民族的力量這個問題，才解釋得了我們民族的組成以及過去所以衰而復興、亡而復存的問題，才解釋得了如何準備反攻、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問題（即要不要動員民衆、實行民主的問題），才解釋得了抗戰後中國誰才應當為主人翁的問題。在幾年前，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共中央許多文獻，曾給我們答覆了這個問題。但是「中國之命運」的作者却把「少數人士」和「德性」當成民族的決定者。這就是我們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關於中國之命運問題上的根本分歧點。

## （二）關於中國歷史

我們繼續說中國歷史，特別說一說近代中國的歷史吧。中國歷史應該是民衆的歷史，因為沒有中國民衆，就沒有中華民族。中國歷來和自然界戰鬪、和黑暗制度戰鬪、和侵略者戰鬪的主要力量，是

中國勞苦民衆。民衆是中國歷史的主要動力。中國民衆歷來創造一切幸福，但是他們自己却沒有了。一切幸福。中國勞動人民和民族的苦難戰開，但是在過去，一切果實却被少數統治者撈取而去，而自己則仍落到最受苦難的結果。每當中國民衆被統治者剝削壓迫得最痛苦、最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外患也就隨之而來，但民衆又成爲「我必復之」的力量。蔣先生說：「自滿族入關以後，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漸漸消滅了。」這話是完全不對的。事實上，滿族入關以後，失掉了民族思想的，是那些統治者和高等士大夫，而廣大人民群眾，仍然是最富於民族思想的，並且不斷地進行了民族的鬭爭。歷史越是在近代方面轉移，則民衆的自覺力量也越大。在滿清入關以後，中國人民的民族思想，遠比過去任何異族統治中原時代要廣大、要深入、要長遠。三合會組織的蔓延及其長期不被消滅，就是最好的說明。孫中山先生也說：「……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惟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爲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這是公道話。民衆的民族思想的發展，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和此相伴隨的，就是腐敗人們奴才思想的發展，而其登峯造極的代表人，就是作者書中所不斷稱讚的「會黨生」即「會文正」（不要忘記呀，這是滿清朝廷因爲他勦漢有功而給他死後的諡號）。至於作者關於滿清的歷史，如此寫着：「有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制政令的精密，猶能紹漢唐的餘緒，實可以超越宋明，更爲元代所不及……假使滿清對國內漢滿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視同仁，認識我五族在實質上本是整個的一體……但這是時代與思想的關係，我們非所望於當時的滿清能施行這種政策，固不可求備太苛……」這些話裏一點民族思想也沒有，則是千真萬確的。

清代中葉，中國民族遇到了一種和過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民族侵略者，即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國家。這種新的民族侵略者挾持其資本主義的優越經濟力量，打開了中國的長城。但中國人民並不是不能抵抗這種新的民族侵略者的。中國抵抗力的軟弱，是由於滿清朝廷一方面在國內各民族之間所造成

的民族牢獄。另一方面在人民之間所造成的專制主義牢獄。作者說：『我們百年來國勢的陵夷，民氣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條約爲造因』。這是倒果爲因的說法。中華民族爲什麼會被釘上不平等條約的枷鎖？這難道不是因爲萬惡的滿清黑暗專制政治，使得民氣不得發揮，人民不得奮發起來抵抗侵略者才產生出來的一種結果嗎？如果按照作者的說法，則在訂立不平等條約之前，應該是國勢鼎盛、民氣興旺的時候了。但是，既然國勢鼎盛、民氣興旺，爲什麼又會有不平等條約呢？

但作者又說：『國恥之所由招致，又必須追溯於滿清一代政治的敗壞，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落』。這不就是『原因』了嗎？如果這是『原因』，那末，前面所說的『原因』又是什麼呢？如此邏輯，豈非自相矛盾？姑且也研究一下：第一，作者這裏說的是『政治的敗壞』（帶一筆：作者不願意說是專制政治，此點我們後面還要說及），這又是自相矛盾；作者不是盛讚滿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制政令的精密』嗎？第二，如果按照作者所說，『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落』，所以有了國恥，可是，作者不是說過嗎：『滿清道咸年間，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之流，亦以轉移風氣爲己任。曾文正行法主剛，而用人則重血性，尚器識。其於學術思想，則兼取宋學與漢學而歸本於至誠，其立身行事，則本於『慎獨、主敬、求仁、習勞』的精神，故湘軍淮勇的成功，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樣，宜若國恥可以由此減少了，爲什麼又弄得國恥如麻呢？歷史的教訓顯然和作者所說的相反：原來中國之弄的國恥如麻，恰恰是因爲曾國藩李鴻章輩的『湘軍淮勇的成功』。不是嗎？請研究一下：太平天國會統治了許多省份，時間十餘年，和外國人也有來往，但是，太平天國畢竟沒有和什麼外國訂過不平等條約，不就是因此惹起洋大人生氣，組織了『戈登常勝軍』，使太平天國內外受敵，而陷於失敗嗎？如果太平天國獲得勝利，把『曾胡左李之流』打得落花流水，打倒了清朝，建立新國，發揚了民氣，創立了國防，則外國侵略者就不可能使我們這樣多的國

恥。所以我們說，湘軍淮勇的成功，就是民衆的失敗，也就是洋大人的成功。民衆失敗，洋大人成功，國恥自然就多起來了。

應該介紹孫中山先生的兩段話：

其一：「從前衰弱，實因壓抑於專制淫威所致。」

其二：「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便非提倡民權不可。」

孫中山先生的話，是扼要而中肯的。中山遺訓在其信徒中的被遺棄，不是很可悲的嗎？

要救中國，必須發揮民權，必須把舊中國重新改造。這不是天經地義嗎？其所以要把舊中國重新改造，不就是因为舊中國的統治太黑暗、太殘酷、太落後、太虛偽嗎？不就是因为舊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無孔不入地剝奪廣大人民——首先是農民——的血汗，使得廣大人民飢寒交迫，因而使得國民經濟不得發展起來嗎？不就是因为舊中國的統治方法從保甲制度到中央政權，都是窒息人民的生機及其政治活動嗎？不就是因为舊中國的思想教育制度及其政策是愚民制度和愚民政策嗎？不加改造的舊中國，如何站得起來？如何能够抵抗得外患？在今天抗日戰爭中不求進步，一味倒退，又如何能够最後戰勝敵人？然而不幸，「中國之命運」的作者竟把這樣的舊中國寫成「黃金世界」，海禁開放前舊中國的經濟是發展得那麼好，政治是那麼好，風氣倫理是那麼好，一切都幾乎是全世界第一。河怪的，既然是一切都那麼好，爲什麼打不過外國侵略者，而且要時常與當時的敵人作城下之盟，訂立那麼多的不平等條約呢？本書的自相矛盾，這又是一件。

爲使讀者明瞭起見，把作者所描寫的中國古代「黃金世界」抄列於下。讀者一見，就知全是妙文：

關於經濟：「我們立國的基礎，本是農業。全國的農業，除邊疆省區外，分佈既不失均衡，故全國的人口，疎密亦相差不遠。政府對全國交通的計劃，平均周遍，世代相承。經濟的趨勢，雖起自河流而傾向海岸，然而建國的成規，並不見有什麼偏枯的現象。」（一一五九頁）

關於「社會組織」：「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在血統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鄉社。兩方面的系統都很分明，兩方面的訓練和教育，亦最爲古來的賢哲所致力。由個人日常生活的箴規，推而至於家，則有家禮，有家訓；推而至於族，則有族譜，有族規。在保甲則有保約，在鄉社則有鄉約和社規。其自治的精神，可以舉修齊的實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謀公衆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則有鄉校和社學。言賑濟則有義田和義莊。言積穀備荒則有社倉的儲蓄。言防盜緝姦則有保甲的連坐。乃至堤防溝洫，道路河川，無不由鄉社的羣力，以從事於修築和疏濬。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禮運所謂「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常活躍於中國固有的實際社會之中，而表現其具體的成績。」（一一六一，六二頁）

關於社會風氣：「社會風氣，五千年來尤爲我國先聖先賢所終身倡導和致力不倦的大業……社會的風氣仍能精誠篤實，勤苦儉樸，崇禮尚義，明廉知恥。我們中華民族所以能久存於世界，此實爲其基本原因。」（一一六二，六三頁）

關於「倫理」：「我們中國古來的倫理哲學，對於人類社會相繫相維之道，有詳密精深的研究。社會的組織雖有不斷的演進，而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長幼之序，乃至隣里相恤，疾病相助，實爲社會生活不變的常理。」（一一六七頁）「中國固有的人生

哲學，經孔子的創導，孟子的闡揚，漢儒的訓釋，自成爲崇高的體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別的哲學，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中華民族仍虛心接受外來的宗教，且能夠擷取外來宗教精深的哲理，使其與中國固有的人生哲學互相發明。」（一一六九頁）

猗歟休哉！使我們走進了一個極樂世界！但是，既然舊中國的封建農業經濟是那麼好，爲什麼日本帝國主義匪徒却提出了「農業中國、工業日本」，那麼喜歡保留中國的封建農業經濟呢？既然舊中國的保甲制度是那麼好，是那麼對人民有利，爲什麼日本帝國主義匪徒却在淪陷區大大推行保甲制度呢？既然舊中國的社會風氣和倫理思想是那麼好，是那麼爲全世界所不及，爲什麼日本帝國主義匪徒却在淪陷區大大提倡中國「固有文化」，「東方固有道德」呢？難道日本帝國主義匪徒真的愛起中國民族來，所以要中國人去保留、發展這些「好」東西，來破壞日本匪徒自己的侵略嗎？歷史的真理，有的要等待深思熟慮的思想家來發現，有的則雖愚夫愚婦亦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日本帝國主義匪徒之所以特別要中國人去保留發展這一切腐朽的、陳舊的、落後的東西，就是因爲這些東西是絞殺中國歷史發展的工具，是絞殺中國人民反抗的工具，是絞殺中國人民自覺的工具。蔣先生竭其全力去頌揚這些東西，其用意究竟何在呢？蔣先生所喜愛的這些東西，日本法西斯也喜愛，難道也是「口之於味有同嗜，耳之於聲有同聽」嗎？至於蔣先生的唯心主義的歷史觀，我們是完全不能同意的，爲篇幅所限，暫不詳論。

### （三）關於中國近代思潮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者侵畧中國，喜歡中國人保留中國各種舊東西，不喜歡中國人在經濟上、在

政治上、在思想上近代化——就是說，不喜歡中國人接受西方人已有的先進的東西，不喜歡中國人有科學、有民主、有自覺；因為接受西方人已有的先進的東西，因為科學、民主、自覺這類東西，會使得中國變成近代的強盛中國，就不利於侵略者。所以，不平等條約是成爲中國人接受和發展西方先進的東西的桎梏。但是『中國之命運』的作者的反解却相反：好像因爲有了不平等條約，才使得中國人接受了歐美先進的思想，所以不平等條約是不好的。特別對於五四以來的各種新文化，作者極盡了謾罵的能事，所謂『不平等條約影響之深刻化』，其重點就是對此而說的。

什麼是五四運動呢？請讀我們先引毛澤東同志『新民主主義論』的一段話：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着爲辛亥革命還不會有的姿態，這就是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國主義與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封建。五四運動所以具有這種性質，是因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一步的發展，而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階級，又眼見得俄、德、奧、意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綫的革命運動……。五四運動的文化革命，則是澈底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澈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爲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建立了偉大的功勞。』

所以，五四運動，是中國民族自我覺醒的偉大新紀元。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大革命，沒有土地革命。沒有六年來的大抗戰。五四運動之所以遭受一切反動派、反革命派的痛恨，其故即在於此。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受苦受難，並在中國培養一批洋奴才（從曾國藩、李鴻章起，到現在希特勒、莫索里尼、東條在中國的一切徒子徒孫為止，這批洋奴才始終爲外國侵略者服務，不因爲他們主張中國舊文化、舊倫理、舊道德，而就可以說不是洋奴才）。但另一方面，却又迫得中國人民從迷夢中驚醒起來，迫得中國人民要去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用來反對外國侵略者及其中國的奴才。中國人民的先進者反對舊中國的黑暗的、殘酷的東西，因爲這些東西便利於外國侵略者及其狗奴才；中國人民的先進者接受外國先進的光明的東西，因爲這些東西不利於外國侵略者及其狗奴才。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中國的革新思想，從太平天國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起，便已開始了。譚嗣同的「仁學」，對於中國舊倫理舊道德的網羅，即作了一次勇敢的衝決。那時思想的反動派，西太后的奴才，如葉德輝、張之洞等類人，便已在這種革新運動面前哭泣咒詛，他們都一致說：「倫理」、「聖道」是永遠不變的。這種見解，一直到現在，仍成爲中國一切漢奸、一切反動派的衣鉢。五四運動形成了思想上的羣衆運動，就使得許多頑固派、反動派、洋奴才都驚駭得不知所措，表現了新力量的不可抵抗。然而歷史運動是曲折的，有的繼續前進了，有的中途停止了，有的變節向後轉了。始終成爲新文化的中流砥柱和衝鋒陷陣的戰士，只是中國共產主義者和中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他們代表了中華民族起死回生的方向，永遠不變節，永遠不妥協，是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最偉大體現者。

「中國之命運」的作者這樣寫道：「五四以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其流風之所至，一般人以爲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國的一切都不是。他們崇拜外國是一樣的，其所以各

成派別，是由於外國不只一國，外國的學說也不止一派。他們各仿一國，各宗一派，因而各立門戶。入主出奴。各國的學說，既不斷的變遷，所以他們無論那一派的持說，也是不得不隨之不斷的變化的。……至於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則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治，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愛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請研究一下！世界各國先進的思潮，確實有不同的，因為有一種進步思潮（比如民主主義）反映某一種進步的時代（反封建時代），為某一種進步的、革命的階級所需要；又有另一種更進步或最進步思潮（共產主義）則又反映另一種更進步的時代（反資本主義時代），為某一種進步的、革命的階級所需要。近代中國處在全世界大變革時代，中國內外各種關係、各種階級、各種社會人物的鬥爭錯綜在一起，因此，那怕在同一時候，世界各種不同的進步思潮，都可能為各種一定的社會階級代表所接受，並形成一定的合作。比如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孫中山就接受西方林肯等人的民主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後來又接受了某一部分俄國革命經驗（孫中山說過『以俄為師』），而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接受了科學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兩方面在一九二四年後就形成了彼此的合作。這是對民族極有利的，大革命業已證明了。又比如：中國還有其他一部分自由主義者或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思想都反映了一定的階級或階層。而根據其需要，也可能在一定時候及一定問題上和共產主義形成一定的合作。這是對民族也有利的，許多事實也證明了。這一切是否『一切於中國國計民生』，必需以民族利益民眾利益為考驗。除此以外，一切就都是詭辯。蔣先生在此公開反對英美的自由主義思想與蘇俄的共產主義思想，實在可怪之至。一切法西斯國家以及漢奸汪精衛，不正是每時每刻都在狂吠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嗎？蔣先生此書一出，難道不怕希特勒、莫索里尼、東條、汪精衛輩引為同調，而使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

以及一切反法西斯的人們覺得可惜，覺得齒冷，覺得喪氣嗎？

其次，世界各國不但有進步和革命的思潮，並且也有反動反革命的思潮，因為中國既然有進步與反動，有革命與反革命，那末，世界的反動反革命思潮，也就會被發覺中國人所歡迎，所崇拜，別的不說，舉一個最最近的事實，國民黨官方出版的「三民主義半月刊」和「中央周刊」，不是正在大肆宣傳希特勒、莫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並把希特勒、莫索里尼尊為世界兩大領袖之一嗎？這還是公開的，因為法西斯主義太臭了，太違反民族利益了，太不利於同盟國了，太為德意日這類匪類張目了，所以有些人也就不便明目張膽公開掛法西斯主義的招牌，而用各種掩護形式去販運法西斯的私貨，到處拍發，這不僅是有計些國民黨官方中小人物如此做，就是大的人物也竟然如此做，這難道不是天下共知的嗎？

其次，說「各立門戶，各出奴才」，每一個人都應該自己理想的，中國有位內人先生，當俄國十月革命後有中國大革命時候，認為蘇聯對他是有利的，於是他就跑到蘇聯去請教，並派自己的兒子到蘇聯去留學，並宣稱中國革命必須受第三國際領導，後來反共了，反蘇了，於是到了東京，會見日本特務頭子頭山滿，宣稱中日聯合之必要，於是又進了「外國的」基督教，後來希特勒在德國登台了，就又趕快派遣了自己的兒子波夫，大批黨徒到德國去留學，去學習法西斯主義，而貨幣靠外國，軍械靠外國，有整整十年，還依靠這些去專打革命的中國人，而計劃這種戰爭的人，却又是外國人，其中有一個很著名的德國人叫塞克特，是德國國防軍的領袖，還來了一個德國警察廳長，專門傳授特務方法。抗戰了，貨幣、軍械還是都靠外國，連仗都想專門依靠外國人去打。這些都是什麼？不正是所謂「入主出奴」的思想和行爲嗎？這不就是一种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憂嗎？

至於要說到共產黨那末，倒也可以算一算看，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是毛澤東的思想，可是中國作

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個思想中固不但和蘇聯共產黨的思想相符合而且也適合世界各國共產黨思想相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要求每個國家的共產黨人根據自己的國情提出政綱。決定政策。而依據人民自己拯救自己。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立作是這樣做的。他們爲中國民族中國人民而創造了各種進步力量，完全不是靠外國軍隊起家的。沒有外國軍隊是靠外國幫助的。也沒有靠過外國錢作戰略也全靠自己。一切都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八路軍斷絕了。抵抗日寇在華南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從來不讓外國人替中國打仗。在中共勢力所及的地方。更從沒沒有和外國人訂立過一條或半條的不平等條約。例如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州協定之類。中國共產黨人的政策和行動。到處爲中國人民所歡迎。因爲是符合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今天依靠這國。明天依靠那國。而以主出故。口翻雲覆雨的事。上述的一切。都是中國共產黨思想指導的結果。這真是一個十全十美的。爲中國而專爲中國而用的。中國人自己的革命政黨。在中國，再沒有可以和他相比擬的了。

實，中國從來顯然有兩種文化傳統的思想。一種是民衆的。對革命的。光明的好。一種是反民衆的。反革命的。黑暗的。近世中國開始時候。公認孫中山與孫中山就代表前者。而袁世凱及現在中國的種種。反共反民分所就是代表後者。大不來。天國有外國的思想。自由平等博愛。却是真正代表中國人的思想。中國的英雄。不管會國滿口着中國的好義道德。宋五倫五常。却仍是雙重的奴才。王漸以。孫中山。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中國從來以空洪秀全。孫中山。一切優良的革命的傳統。而一切反動派則繼承會國滿口着袁世凱的傳統。反動派想取消前一種傳統。保留後一種傳統。而我們則正相反。關於中國文化思想問題上的分別。就在這裏。



性質的東西，此種舊民主主義並沒有包含澈底地反對封建社會制度、解放廣大勞動人民的內容。必須明白揭出反封建的口號，才使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有了新的內容。中國革命民衆必由此等反帝反封建的政綱，始能重新獲得革命的方向，而動員起來。中國國民黨必由此等反帝反封建的政綱，始能重新走上革命的正確道路，而和革命民衆結合起來，獲得革命的新生命。請問：誰首先給中國民衆提出了這個明確的革命政綱？誰幫助了孫中山先生把這個革命政綱變成國民黨的政綱？請問：這不是中國共產黨人是誰？請問：辛亥革命以後，國民黨即和民衆疎隔起來，爲民衆和青年所冷淡，而改組後情形就大不相同，國民黨又開始和民衆聯系起來，國民黨又開始爲青年所注意，這是不是因爲有了新的政綱，有了這反帝反封建的政綱？而國民黨之所以有此，除了孫中山先生的英明遠見以及一切真正贊助孫先生這個英明遠見的國民黨人之外，是不是應該感謝中國共產黨？是不是應該歸功中國共產黨？「中國之命運」的作者是親身經過這一段歷史的。大家都捫心自問吧，爲什麼不把這段歷史寫出來呢？請問：抹殺這一段歷史，這就是「公」嗎？這就是「誠」嗎？

其次：在國民黨改組前，國民黨的組織情形又如何？那不是幾乎一切都被軍閥政客、貪官污吏、地痞、流氓所把持所壟斷的嗎？那不是既無革命的組織，又無革命的宣傳的嗎？革命的工人農群衆及小資產階級群衆不是都關在黨外嗎？但改組以後的國民黨的組織情形便不同了：直到清黨爲止，國民黨的組織情形變得有生氣了，成分改變了，國民黨的組織變得眞像是革命的組織了，因而促進了大革命的勝利。請問：這不是中國共產黨人所幫助所規劃的功勞是誰的功勞？大家都捫心自問吧，爲什麼不把這段歷史寫出來呢？請問：抹殺這一段歷史，這就是「公」嗎？這就是「誠」嗎？

又其次：在國民黨改組前，孫中山先生大元帥府所指揮的軍隊，有那支算得起是革命的軍隊？有那支能打得仗的軍隊？中山先生進行多少年的北伐，有那次北伐成功了？可是，在改組後，情形不同

了，培養革命軍官的黃埔軍校建立起來了（開始創議組織這個學校的是孫中山先生、廖仲愷先生和俄國顧問，當時「中國之命運」的作者並不認識這個學校的重要，還不願當校長呢），由此革命軍隊也建立起來了，革命軍隊的政治制度也建立起來了，這樣就很快地兩次打败了陳炯明，又打败了楊希閔、劉震寰，最後得以進行北伐的戰爭。當時這種革命軍隊的建立和戰績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中山先生摸索了幾十年，沒有摸到門徑，但一旦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和蘇聯合作，幾年之間，便有如此偉大的軍事成就。國民黨勢力之所以得到武漢南京，所以有今天，是誰之功呢？大家都捫心自問吧，爲什麼不把這段歷史寫出來呢？請問操殺這段歷史，這就是「公」嗎？這就是「誠」嗎？

蔣先生說：「國民黨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義與責任義務，爲組黨的精神。他絕不像其他黨派，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而以利害自私爲結合的本能。」好吧，就看歷史吧，歷史是做判斷的公正人。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的幫助是那麼大，那麼起決定的作用；一九二四年後國民黨所有的革命事業，和中國共產黨的名字完全是分不開的。就說打仗吧：兩次東征，幾路北伐，中國共產黨人及其所領導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無不身先士卒，衝鋒陷陣，犧牲了多少！蔣先生在爲黃埔同學錄寫序言的時候，也不能不承認共產黨人所流的血和國民黨人的血是分不開的。但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究竟用了什麼「報德」呢？在統一廣東後，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既獲得了一定的地位，於是就打算到那本來是他所依靠的共產黨人身上了，爲着達到其打擊的目的，就製造了三月二十日的所謂中山艦事件，這事件據作者說是共產黨陰謀的，但歷史教訓是很多的，希特勒焚燒國會，不也說是德國共產黨人的陰謀嗎？當時中國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們所以舉行這個三月二十日的罪惡的陰謀，第一步就是爲的造成藉口，以便把中國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從黃埔軍校中，從國民革命軍中的主要工作職位上驅逐出來，並爲的實行在國民黨內限制共產黨人。當時進行這種陰謀的人，很明白中國



這些事來，對共產黨加上各種忍心害理的詛嘆。真的，對於我們共產黨人，對於一切有正義、有血氣的中國人，如果不提起這件事便罷，若是提起這件事，就會熱血湧上心來。因為這是血債呀。這是我們共產黨人流了血的呀。這是全國無數革命有為的青年和工農勞苦羣衆流了血的呀。這是全民族精華的血呀。自清黨以來，死在國民黨刀下的人，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

蔣介石先生說：「當時汪共同謀的內幕，我到了今天，還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銘利用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利用汪兆銘呢？還是汪共互相利用呢？」蔣先生發出的問題是可笑的，然而也是含有重大陰謀在內的。這就是要說共產黨是和漢奸汪精衛有勾結。好吧，我們來說歷史！大家知道，在大革命過程中，不但當汪精衛還革命的時候，有過「汪共同謀」，同時當蔣先生還革命的時候，也有過「蔣共同謀」。當汪精衛還革命的時候，爲什麼不可以和他同謀呢？正如當蔣先生還革命的時候，蔣先生爲什麼不可以和他同謀呢？至於說到「利用」，那末歷史的事實既然那樣清楚，誰在利用誰？不明不白，共產黨人無一不用「利用」作麼人之必要，而只是認爲在對革命有利的條件下，有確定的人們在權必要利用而另有一種人則確是存心利用共產黨人的，對他有利的時候就利用，一等到他得了地位的時候，就拿了朋友去屠殺。這還包括汪兆銘，也包括蔣介石。蔣共不認爲汪共，汪共認爲蔣共。命令之遺裏倒要問蔣介石和汪兆銘以後外汪兆銘是和蔣先生同謀很久的。汪兆銘在與汪共同謀的時候，並沒有簽訂蘇俄協定，也沒有跑出去當漢奸。不但汪共同謀時期完全不同，就是汪兆銘當行政院長和外交部長時提出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賣國政策，簽訂了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權協定，又發表了「陸海軍宣言」，因此還和日本交換了大使。撤職後，蔣先生當了國民黨總裁，汪兆銘當了國民黨副總裁，並被國賊黨中央委任爲參政會議議長。蔣先生面他還從重慶逃往南京，當起天字第一號大漢奸來。這一切何謂讓國讓地，我們到了今天還是不明不白，究竟是蔣介石利用汪兆銘呢？還是汪

兆銘利用蔣介石呢？還是蔣汪互相利用呢？

關於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裂，後來綿延十年的內戰，蔣先生認為「追原禍始，仍不外乎是由於這漢奸汪兆銘拱手造成的所謂『寧漢分裂』的『日暮慘劇』而來」。這實在未免太看輕作者自己，而太重了漢奸汪兆銘了。請讀研究一下：寧漢是怎樣分裂的？豈不是因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開始的「清黨」麼？「四一二」清黨的「一手造成者」是誰？豈不就是你蔣介石先生麼？當時汪兆銘到武漢投革命之機，是在寧漢分裂的局面既成之後，而不是在寧漢分裂的局面既成之前。帝國主義與南京反動政府共同威脅武漢，汪精衛就由動搖而反動起來，到了那時，汪精衛的清共不就馬上趕上了你蔣介石先生的清共了嗎？

總觀作者這一段的深意，似乎以為假如沒有武漢政府，則共產黨早已「網打盡，早就沒有什麼『共產黨問題』了，因此，作者感到悵悵；可是，作者錯了，無論在任何場合，共產黨是殺不盡的，『死不完的，中國共產黨總是一『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歷史早已證明過了。

蔣介石先生還羅列了一大篇關於共產黨的所謂「罪狀」，但那些所謂「罪狀」決不能任憑蔣先生想怎樣說就怎樣說去。多年來所結集的百數十萬民族精華的生命，東征北伐的大動力，蔣介石先生尚且不惜加以殺戮，要編造「罪狀」，有什麼費事？還談什麼「良心」？中國共產黨人知道：要殺戮必須把被殺戮的人的功績完全改成罪狀，這當然也是「殘忍陰謀」中應有的「邏輯」。中國共產黨人經歷了無數的革命憂患，早已看穿了這批自稱代表「仁義道德」，「固有德性」的人們是怎樣一種劊子手大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仁義道德」呢？男盜女娼呢？如見其肺肝矣！

這是不錯的：「這一段革命的教訓太痛苦了，國家的損失太大了，人民的犧牲太慘重了」。但劊子手們的悔禍之心何在呢？

十年內戰，始禍者是誰呢？共產黨人和革命工農被迫得去爲自衛而戰，這也不行嗎？難道真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難道一切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都要像羔羊一樣，不能拿起武器保衛自己，反而甘心去受騙、受捕、受刑、受戮嗎？讓農民得到土地，使得他們可以很好發展自己的生產，這是我們共產黨人在土地革命中所做的工作，同時也就是我們「大逆不赦」的罪名，但這果然是「罪」嗎？爲全民族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謀福利，我們是有罪嗎？「軍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壞我國和平農村」者是誰呢？請查閱你們官方自己在十年中所發表的數目字吧，你們每天總發表昨天在那裡那裡殺「匪」幾百幾千幾萬，今天在那裡那裡殺「匪」幾百幾千幾萬，這所謂「匪」者無他，我「和平農村」之和平農民是也。所謂「剿匪軍」者，這裡燒一城，那裡燒一地，大砲也，飛機也，機關槍也，這些外國所供給的東西，都集中起來轟炸「我國和平農村」，甚至連「我國和平農村」在田裡的稻穀，都要設法加以燒燬而後快，這就是「公」！這就是「誠」！這就是「仁義道德」！

中國共產黨人和民衆在一起，堅苦奮鬥，領導紅軍突破「圍剿」，終於保存了中國最優秀的民族精華，鍛鍊了一支身經百戰的民族大軍，能够在偉大抗戰中抵抗在華敵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支撐了中國半壁河山。向使只有國民黨的軍隊，沒有共產黨所鍛鍊出的這支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抵住那樣大數目的敵人，能够獨力擋住敵人的進攻麼？如果國民黨軍隊不能獨力擋住，則敵人不就早已長驅直入重慶、昆明、西安、蘭州麼？中國安得有今天？中國安得被列爲四強之一？而國民黨當局諸公亦安得仍然安穩穩地坐在重慶？」

蔣先生說：「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但是事實又是如此，沒有中國共產黨，附三民主義就沒有新的內容（首先是民族主義中的反帝廢約的內容）；沒有中國共產黨，蔣沒有大新命帶來直至今天的中國國民黨，沒有中國共產黨，則不但大革命的局勢不可設

想。即六年來大抗戰的局面亦不可設想。中國共產黨生來就是爲民族和人民謀利益的，而它幫助人家做事，本來也沒有自誇的必要，但是許多狠心的國民黨人對於中國共產黨不但採取圍剿拆橋的手段，而且還極盡其造謠誣蔑之能事。共產黨人還有一張嘴巴，因駁斥這些反革命的誣蔑是完全必要的。當試問中國共產黨人的忠心爲國，是天下共見的。在西安事變前，中國共產黨人屢次向國民黨呼籲停止內戰，團結抗戰。但有的國民黨人以自己的自私度人，却以爲這是共產黨人走頭無路迫而出此言的結果。可是，西安事變爆發了，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趁火打劫」，而且爲着民族團結，不記清黨之殺和十年內戰的血海深仇，毅然決然主張釋放蔣先生。但蔣先生雖被釋放了，却還是要設法消滅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以怨報德」，真是資產階級的哲學。蘆溝橋事變爆發，抗戰實現，而中國共產黨及八路軍新四軍，馳赴疆場，深入敵後，戰功卓著，名滿全球。但國民黨人對之採取了如何的態度呢？不但封鎖了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消息，而且仍然在那裏大批的捕共產黨，殺共產黨。罵共產黨，打共產黨，派遣大批特務鑽進共產黨中來，企圖這樣內外夾攻，使得共產黨完全「消滅」。這固至在敵敵後，國民黨人領導的軍隊不打日寇，而去專打那種打日寇的八路軍新四軍，形成與日寇共同夾擊八路軍新四軍的局面。然而這些都不叫做「機巧權術」，都不叫做「殘忍陰謀」，都不叫做「利害自私」，而却是叫做「至公」，叫做「至誠」，叫做「不自私」呢！

對於上述這一切，我們也是因爲「相忍爲國」，許久都不願見之口舌和筆墨。但蔣先生在其所著「中國之命運」中既然如此集矢於中國共產黨，近日國民黨又繼續中央社發表要求「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的消息，同時準備武力進攻邊區，我們對於是非真相，如果非要臧厥，則不但對不起無主斷流血犧牲的共產黨員，而且也對不起全國人民，對不起中華民族，對不起二十七年來的歷史。這固是「中國之命運」的第七章，「中國革命建國的動盪及其命運決定的關頭」，這是全書的核心，其



犬犬對於汪精衛漢奸群的寬大，對於日汪奸細陶希聖、吳開先的寬大，對於三十三個投敵將領的寬大，對於洋狗坐飛機的寬大，對於孔令儀小姐攜帶大批嫁裝坐飛機到美國去結婚的寬大……好了，蔣介石及國民黨當局諸公確實有了無數的寬大。但是試問這些寬大對於國家民族有什麼利益呢？除了盡博盡量地破壞一切抗日人民的積極性、自信心、自尊心與創造力，除了把國家民族引入絕路，還有什麼別的結果沒有呢？

其次，請研究一下「變相軍閥」。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抗拒敵人在華半數以上的兵力，國民政府不發槍，不發彈，不發餉，而他們竟能如此作戰，這是史無前例的最勇敢的民族先鋒隊，這就是「變相軍閥」嗎？八路軍新四軍出自民間，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擁政愛民，自力生產，而又為民衆所愛戴，這就是「變相軍閥」嗎？如果有人硬要加以「變相軍閥」之名，則試問：這種「變相軍閥」對於國家民族何害？對於人民何損？反之，不是越多就越越好嗎？不是越多抗日就越有力嗎？不是越多人民就越有保障嗎？我們倒要查查中國境內的真正軍閥了，一切反共反人民的東西，不都是真正的軍閥嗎？真正的軍閥在中國境內橫行無忌，跋扈已極，却敢於辱罵共產黨人為「變相軍閥」，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再其次，研究一下「新式封建」。比如陝甘寧邊區吧：這裏有民主政治，這裏有人民的安居樂業，這裏有軍民的一致熱烈發展生產，不斷出現勞動英雄，這裏的人民與人民，政府職員與民衆，軍隊與人民，大家互相親相愛如一家人，這裏在短短幾年之間，便一掃過去在軍閥官僚黨棍特務統治下的荒涼與貧困，大家逐步走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這就是「新式封建」嗎？如果有人硬要加以「新式封建」之名，則試問：這種「新式封建」對於國家民族何害？對於人民何損？反之，不是越多就越越好嗎？是越多就是五民主義實現得更廣嗎？不是越多就是中山先生遺囑更可以在最短期間促其實現

嗎？我們又要查查中國境內的舊式封建，殘酷的慘無人道的壓迫與剝削，比秦始皇還厲害百倍的寡頭專制政治，幾百個橫行全國的反共特務大隊，這不是中國式的實辦的封建的法西斯政治嗎？

我們不知道蔣先生所說的「我不出有什麼合理的方法」，是否即是指非內戰不能解決。若然，我們敢爲民族請命！爲人民請命！難道十年內戰的經驗教訓還不夠慘嗎？

蔣先生說：「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蔣先生空書的精神，可以「對內」二字概括之。但是我們知道，今日大好江山還淪陷敵手，就使英美已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但那些東西都在淪陷區，不戰勝日寇，一切就都是空話。抗戰前途還極多艱難，今日基本問題顯然是對外——即共同對日，而不是對內——即準備內戰。蔣先生提出或者是「精誠團結，奉公守法」八個字，或者是「詐欺虛偽，毀法亂行」八個字，而且認爲：「這是我們中國命運的分水嶺，其決定即在此抗戰時期，而不出於這二年之中。」但是有問題還是要請問的：製造磨擦，發動內戰，「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是否即「精誠團結」？降敵叛國者不加討伐，抗敵有功者不加獎賞，貪污橫行，豺狼當道，封建遍地，專制自私，是否即「奉公守法」？威脅利誘青年去做特務，要他們鑽進共產黨，鑽進國民黨以外的一切所謂「異己」黨派，「異己」集團，鑽進一切民衆團體，鑽進文化界、教育界、經濟界，要他們不做正派而做兩面派，是否即「詐欺虛偽」？拒絕實行三民主義，拒絕實行抗戰建國綱領，而且所做的適和三民主義及抗戰建國綱領相反，是否即「毀法亂行」？在此抗戰時期，不出於這二年之中，要在國內決定命運，是否意味着要在今年兩年之內組織國內戰線，消滅一切「異己」？我們是希望蔣先生給我們解釋這些問題的，因爲我們曉得：自從有了法西斯主義或公開地或掩蔽地在中國出現以來，字典上就有許多不同的解釋了。如果「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後，幾個戰的工具，則蔣先生將得以自解於國人，無怪自一九四三年五月間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後，幾個



衆人往往正在想假「公論」假「誠實」假「不自私」之名，要解散共產黨，要取消邊區，要準備進行大內戰。如果不是以個人的私慾爲前提，不是以個人的私利爲中心，試問又是什麼呢？

問題。

### (五) 爲中國民族前途呼籲、爲中國民衆、

自由、反對代黨因循守舊、反對

### 中國青年們、孩子們、呼籲

熱風又戰後的中國應該怎樣的中國，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共中央關於抗戰五週年宣言，也明白指出了。但是這了「中國之命運」我們有許多疑難問題應該及早提出正義的呼籲。而這個呼籲也和今日關於反對分裂內戰、堅持團結抗戰的呼籲恰是密切相關的。列衆。而意謂呼中國之命運共一中國之命運。在政治上是以前專制主義爲其借口的。作者這種稱頌清朝「消清」代，建國規模的宏遠，專制政令的精密，猶能遠紹漢唐餘緒，實可以超越宋明，更爲元代所不及。這說來，返觀我們神國歷代的政治，大抵對人民取寬大的態度，人民納了糧之外，幾乎與官吏沒有關係。中國人與老早就有很大的自由，不須法律。按照作者的說法，自古不平等條約訂立以後，中國的學術思想界決法得借信心，只知道附和着從外國的學說。於是有些伏士，援以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學說，來破壞我們國長的法法觀念。我們知道早民法思想輸入我國，引起了我們國民達開了眼界。起來作推翻專制政體的動靜。而中山先生曾經是這樣助戰。作者看來，這些都是白費的。因爲中國老早就有法法治了。這豈不是說：如果沒有不平等條約的援助，國政治進步的方針都回畫着華美了。這種見解，不僅有背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而且違反今日中國人民的希望，違反了同盟國反法西斯戰爭的目標。作者又說：「要知道我們中國的民主制度，雖然不以歐美十九世紀個人主義與階級觀念的民主制爲模範，但就是說：不但不要斷絕民主主義，決不讓也還要舊民主主義，不願對於民衆又不許其自由。否則

這不是法西斯主義與舊專制主義的混合——新專制主義是什麼？則這不是中國式的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是什麼？作者所謂「民主制度」，不過是這種法西斯制度或新專制主義制度的別名罷了。法西斯德國不是還叫做「德國共和國」嗎？

其次，作者把中山先生的「孫文學說」（行易知難的學說）完全向反動方面去解釋，而稱讚孔子所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稱讚了孔子誅少正卯。孔子的愚民哲學，居然被公開捧出來了。孔子誅少正卯的殘忍陰謀，章太炎早已揭穿無遺，不料蔣先生在今日各大多數同盟國提倡思想自由的反法西斯戰爭中，竟然主張誅殺思想上的異己。蔣先生已給一切不相信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即新專制主義的人們發出信號了，他要把一切這些人們都當做少正卯，給他們一個很好的結果，就是一個「誅」字。

「中國之命運」第六章所謂「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其基本內容，就是：其一、反對民主政治；其二、反對思想自由。這真是中國政治危機的所在，中國國民精神（思想）危機的所在。

大家知道，中山先生積四十年的革命經驗，其所得的中心思想是喚起民衆。而這點和「中國之命運」的中心思想正相衝突。或者是擁護民衆，或者是反對民衆。這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革命路線與反革命路線的基本問題，是民族與反民族的基本問題。喚起民衆的中心問題就是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民族力量因此就可以發揚，而反革命路線必將一概加以否認，民族力量因此可以被絞殺。這也是現在中國國體（在其實不在其名）的問題，是現在中國政體的問題，又是民族生命、中國前途的問題。

我國之所以衰弱，所以被外國人欺侮，是由於民衆被專制政治所壓迫；如果在抗戰以後，我們民衆仍然還要繼續受專制的壓迫，則中國仍將不能轉弱爲強，仍將不能達到解放，一切建設都會無望。

這不是我們的危言，過去幾十年的歷史早已證明過了。

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動代表在大後方所進行的特務教育，所採取的對待青年的手段，是極端悲慘的。青年們純潔的心靈，沒有根據自己的生活 and 理智去選擇思想的自由。不僅如此，還有人用「左傾」思想做釣餌，去釣引某些青年，特別是去釣引那些活潑有為的青年，等到他們不及提防上了釣鉤之後，就立即強迫他們簽字發誓到共產黨中、到一切所謂「異己」勢力中去當特務，有的並須要以他們的家庭或某種親屬為質，否則加以格殺。這種方法甚至施行到十三四歲的孩子們。一切情形完全出乎有理智的人類思想之外，其殘忍陰謀和希特勒、莫索里尼、東條這些東西沒有分別，甚或過之。這就是他們的「愛護青年」，「不利用青年」！這就是他們的仁愛真誠！我們敢向全國同胞大聲疾呼！這是對於青年們孩子們的虐殺！這是中國青年曠古未有的精神大災難！這是我們中國民族的精神大災難！我們不知道「中國之命運」作者的所謂「真誠篤實的風氣」是否就是這樣的風氣？要知道這樣的風氣是由國民黨中央特務機關、宣傳機關、教育機關、組織機關以及三青團部直接主持的。

現在聽說「中國之命運」訂為大後方青年們孩子們必讀的「聖經」了。一定要把假造歷史、曲解歷史的東西和葉德輝那套什麼中國倫理聖教是世界第一的衣鉢，強迫灌輸到青年們孩子們的頭腦中去，真是「居心何忍」！這不真是可悲可嘆，而大大足為我們民族前途擔心的嗎？

我們要為中國民族前途呼籲，為中國民族、中國青年們、孩子們呼籲！也為我們中國的後代呼籲！要求蔣介石先生，要求一切真正的愛國的國民黨人，要求一切抗日黨派，要求一切愛國同胞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反對內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反對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反對新專制主義！讓中國民族得到自由的呼吸吧！讓中國青年們、孩子們有機會根據自己的理智去選擇思想和追求光明吧！救救青年們！救救孩子！救救我們民族的後代吧！讓中國不再回到專

制、內戰、黑暗、屠殺、特務——這一類的舊路吧！這以民衆爲主人翁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誕生出來吧！中國萬歲！

（一九四三年八月）

## 誰革命？革誰的命？

范文瀾

蔣介石先生作了一本「中國之命運」，聞已通令全國各黨政軍民學機關誦讀，並提出批評意見，我頗有所感，未敢緘默，略述所懷。

### 一 應該學些革命建國的基本知識

「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那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情。企圖「決定」中國的命運，首先應該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至少應該從「新民主主義論」學得幾條基本原理，才不至鬧太大的亂子。如果有人自以爲是，目空一切，硬想對中國的命運也來一下「獨裁」，那末準備着自己連人帶馬滾到深池裏去。

從「新民主主義論」至少該學些什麼基本原理呢？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已經進入民主主義革命時代，滿清政府不懂得這個道理，誓死反抗潮流，保持封建專制，結果被主張民權共和的同盟會推倒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中國已經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中國革命成爲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堅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國民黨，怕懂得或存心忘記這個道理，誓死反抗潮流，積極輸入「舶來

品」法西斯主義與所謂「固有文化」的封建專制主義，化合而成新專制主義，結果大背國情，民怨沸騰，暴日乘機侵入，造成中華民族空前的危機。

國民黨反動派聽者！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呀！

現在的中國在淪陷區是殖民地社會，在非淪陷區除幾塊抗日民主根據地之外，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論在淪陷區與非淪陷區，都是半封建關係佔優勢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針對着這樣的國情，中國共產黨首先發起了並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是抗日的又是幾個革命階級民主聯合的。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國資產階級如能盡此責任，那是誰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而如果不能，這個責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

國民黨反動派聽者！誰能領導抗日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呀！

統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就是我們革命的對象，我們要革除的就是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與舊文化形態，而我們要建立起來的則是與此相反的東西，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與新文化。

國民黨反動派聽者！睜開眼睛看看什麼是革命的對象呀！

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份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他們必然要成爲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與政權構成的基本部份。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國民黨反動派聽者！決定中國命運的廣大人民是要建立這樣的一個民主共和國呀！

蔣介石先生既說要決定中國的命運，而且也知道「破壞國家，就是破壞你本身以及你世代子孫永久的生命，這個關係太大了」，那末就得實踐「忠言逆耳，良藥苦口」的格言，虛心一讀「新民主主義論」，免得「著作」一部「禍國殃民最後結果非至害以自害不可」的「聖諭廣訓」出來，千言萬語，費龍點睛處。此在反對人民的內戰。

### 三、國民黨的革命性

三、中國廣大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的基本勢力，而工人農民又是基本勢力的骨幹。沒有他們，就沒有革命，也就沒有中國。所謂「中國的命運完全寄託於中國國民黨」，所謂「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没有了中國」，真有那麼一回事嗎？誰都知道，政黨止有領導的作用，它所領導的階級及其聯繫的羣衆才是真實力量的所在。試看國民黨領導了那些階級和羣衆？

中國國民黨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政黨，其中佔絕對統治地位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它的「廣大」可貴的羣衆是軍閥、官僚、政客、土霸、劣紳、閥人、文丐、投機商、託匪、特務、漢奸、法西斯份子、落後的受欺騙的教員和學生等等，一部份進步的有派義感的黨員被壓迫歧視，甚至被監視，早成黨內的黨公。它只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有革命性，而妥協性與反革命性却佔了很大的比重。

三四年前，大資產階級的一部份，以汪逆精衛爲代表，率領大批黨要人及「廣大」羣衆投奔日寇，在南京開張新店，翻印了一個「國民黨」，一個「國民政府」，一個「領袖」，擔任敵後方「剿共」的「天職」，恰恰說明了這種從反共發展到叛國的「國民黨」，「那就沒有了中國」，因此，有了從反共發展到內戰的國民黨，其去「沒有了中國」也就不遠。楚見反共是亡國的道路，理極明顯。

現在還在抗戰的國民黨，在反共反人民一點上，也同樣克盡「天職」，積極進行全黨特務化的工作，特務漢奸與汪記「國民黨」交流合作，情同一家，在近時漢奸吳開先乘飛機「逃歸祖國」，大受歡迎，漢奸陶希聖著書立說，儼成「思想界」的泰斗，漢奸顧炳勳、孫殿英等三十三高級將領前後率部投敵，不受懲處，反蒙開謠獎飾。（七月二十三日中央社還宣傳「龐總司令」被俘前數分鐘，慷慨含憤，告部屬說：「要以國家民族爲重，應本以往精神，繼續奮鬥」，以降敵反共爲「繼續奮鬥」，太丟國家民族的臉了！）這些事實，已使全國人民感到國民黨敵我混淆，面目模糊，形跡甚爲可疑。在最近中央社公開廣播「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的反動要求，並撤黃河防軍，集合精銳十六師，企圖閃擊邊區，完成「統一」，更使全國人民驚駭呼號，怒目切齒，絕對反對亡國滅種、大背民意的反共內戰。按照「國民不包括反革命份子不包括漢奸」的原則，以國民爲號的國民黨，似乎有考慮名義的必要。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欽佩的，他的三民主義曾經三變：有同盟會時代，以排滿爲主題的三民主義；有中華革命黨時代，收起民族主義的三民主義；有國民黨改組至大革命時代，接受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兩大基本任務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而重新解釋的新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認爲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共產黨政綱與三民主義基本上有相同的部份，就是指的這個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自從一九二七年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背叛大革命以來，新三民主義久已高高掛起，無人問津，汪逆精衛於是另製賣國三民主義，替日寇服務；而新專制主義的三民主義，則藉暴力推行於國內，蔣介石先生竟敢借三民主義之名，公然抬出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樣荒謬的鬼話來侮辱人民，保皇黨巨魁梁啟超還知道改裝門面來一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新花樣，這裏自稱「三民主義」者，却提倡愚民政策，肆無忌憚，其思想比梁啟超更倒退一個歷史時

代。要把這種變質冒牌的三民主義作爲「國家的靈魂」，實在是對國家太不敬，幸而中國廣大革命民衆並無如此醜惡的「靈魂」，因之還能保存國格，堅持抗戰，列在四大強國之一，如果外國人譏笑我們是落後國家是劣等民族，應由「我們」變質冒牌的三民主義去承受這個侮辱。

在如此國民黨，如此三民主義的統治之下，軍事則練兵宗旨側重反共，所謂軍紀軍令，不施於降將叛軍，却亂施於忠勇抗日的八路軍新四軍；黨務則收羅大批特務漢奸當作黨的靈魂，陰風慘慘，專以破壞革命屠殺青年爲能事；政治則貪風大熾，敲骨鬩髓，人民逃死無路，民變到處發生；經濟則農村普遍破產，百業凋蔽，全國經濟命脈壟斷在少數金融巨頭之手（其中主要巨頭是蔣介石）；教育則戕賊青年，威脅利誘，強迫接受特務訓練、漢奸思想，充當反共的鷹犬，這樣做下去，抗日的中國能否存在，已成疑問，何顏吹噓「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的成績，亦已經陷著於國民的面前」？替何顏吹噓「中國國民黨是國家的動脈」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動脈裏面的新血輪」？如果國民黨不放棄反共的宗旨，不改變「革命等於反共」的謬見，即使黨和團擴張到異常大，無非增編幾千個幾萬個特務大隊，禍國殃民，造更大的孽，中國何辜，人民何罪，要供養這一羣反動蝗蟲來加深自己的災害？「權利」「義務」那一套話頭，本意就在勸人反共，真正國民是拒絕這種所謂「權利」「義務」的，止有喪失國民資格的「國民」才會享反共的「權利」，盡反共的「義務」。

現在事情很顯然，抗日、民主是革命，反共內戰、專制獨裁是反革命。測量國民黨的革命性究竟有多少，正要看它做出來的是些什麼事情。

### 三 誰是真正革命建國者

中國革命建國的基本勢力也就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基本勢力，決不依靠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黨

的鷹犬們，而是依靠工人農民以及小資產階級。抗戰六週年來，已經輝煌的證實了這個真理。而中國共產黨正是領導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來完成革命建國、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政黨。

中國共產黨一次又一次的從危境中挽救中國，並昭示全國人民從抗戰中建設新中國的實例，試舉幾件人所共知的大事，足夠證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抗戰建國的事業上起了什麼作用和處在什麼地位。

「九一八」事變以後，「攘外必先安內」正「安內」價格外趨動。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呼籲團結救亡，倡導了民族抗戰的先聲。中國統治者有其固有的歷史傳統，故意造成離心離德「一盤散沙」的局面，以便從中操縱，即大將「一個黨」的國民黨本身，也不過是幾百個黨的一個聯合形式而已！中國共產黨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耐心組織國內各民族各階級各黨派在抗日旗幟之下，確立了抗日必勝的基礎；西安事變突然發生，汪精衛勾結親日派準備出賣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當機立斷，力主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先生，因而粉碎了賣國賊謀「結束了十年內戰，鋪平了抗戰的道路；「七七」以後，中日間正式進行大戰，在全國神州缺乏理論的指導，議論靡雜，信心動搖，甚至有人留戀漢奸的誘惑，不能忘情於妥協的死路，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同志及時發表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名著，並隨時發表極危極頑的重要論文，指示了抗戰的正確路程、建國的具體方針，使淪陷區與非淪陷區人民認識中國命運的歸宿地，勇氣百倍地向遠大目標邁進；國民黨頑固反動派掀起皖南事變，企圖變解放戰爭為亡國內戰，中國共產黨揭破反動黑幕，恰當處理事變，使抗日戰爭仍復繼續進行。抗戰初期，國民黨將領棄地覆軍，節節敗退，廣大領土相繼淪陷，日寇進攻，勢如破竹，腹地都市，岌岌可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獨深入敵後，收復失地，建立許多抗日民主根據地，牽制在華敵軍一半，對抗偽軍全部，從此日寇後顧有憂，不敢長驅前進，至今哀哀諸公，得安居重慶西安，窮奢極慾，腰纏累累，可謂得意極矣！過河未半，就動手拆橋，人

之無良，一至於此！中國共產黨與廣大民衆密切結合，自力更生，在各根據地一面抗擊敵僞，一面積極進行新民主主義建設，參三制的民主政治，豐衣足食的經濟發展，思想自由的文化培養，雖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無不欣欣向榮，一齊上進，新中國的基礎確已奠定，試與大後方政治腐敗、經濟凋蔽，文化衰萎、軍無戰意，民不聊生諸現象對照，老朽的舊中國，與發皇的新中國，儼成兩幅不同的圖畫。從此可知革命建國的基本勢力，不是工農和小資產階級麼？領導革命建國成爲人民救星的，不是中國共產黨麼？抗日與民主、革命與建國是兩件事的兩面，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麼？

只敢不敢正視客觀實在的人，才敢閉門自造兩套孤立的計劃，一套叫做以反共爲中心的「革命」計劃，一套叫做以飯碗爲香餌的「建國」計劃。誰都和道反共反民主，國將不國，還有什麼建？即使有所謂「國」者存在，仍不外殖民地半封建的國，而所謂建國，無非建一個汪逆精衛式的奴化國，或一個有姓來老牌的半奴化國，那時候自然會有本國皇親國戚採取計劃，「命定」了束之高閣。

所以事情很顯然，只有共產黨已經實踐的團結抗戰民主建設才是革命建國的正確道路，也只有共產黨才是領導真正革命建國的偉大政黨，全國以反共反人民當作革命，以空談當作建國的野心家，當心被人民拋棄，變爲向隅而泣的可憐蟲！

#### 四、請問究竟想革誰的命

言：抗戰已進入第七年了，竟還有人不認識革命的對象，拿着屠刀想革革命人民之命！其理由是「中國革命的命運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國的帝國主義之手；而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就是操在我們全國

國民自己的掌上」，這裏所說「今後」，當然指本年一月十一日（中英中美簽定新約日）「以後」而言，如此說來，一月十一日以前，操持中國命運的是一般帝國主義，把近年來英美對華的友好援助，與日寇的暴力侵略等量齊觀，毫無區別，甚至借中英中美簽定新約作口實，宣傳中國已得完全解放，似乎日寇佔領中國大部份領土，連同一從前「淞滬停戰協定、何梅協定、塘沽協定等等賣國「外交」，一律掛在英美外交賬上，隨新約的簽訂一筆勾銷，從此中國外交大勝利，萬事大吉祥，可以「全在內政」了！我們會學習過「特別字典」，「革命」的意義，就是反共，「內政」就是反共內戰，「從前」中國還有「外交」的束縛，所以「安內」不够淋漓痛快，「今後」中國完全獨立自由，「內政」大有可為，時哉！時哉！機不可失！「操在全國國民的掌上」，這是騙人的話，其意是說操在中國獨裁者蔣介石的掌上。

從這個荒謬思想出發，產生另一個荒謬思想。就是「中國命運其決定即在此抗戰時期，而不出於這二年之中」，這等於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公開宣戰說。在這「二年」抗戰時期內，企圖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

這也算是先禮後兵、「政治家」的「寬大態度」吧！指桑罵槐的材料，「那邊能算是一個中國的國民，更如何說得上是「政黨」，世界上那一個國家的政黨，有從事武力、倡刺據的方式來妨礙他本國的國家統一，而阻礙他本國的政治，這樣還不是反革命，還不是革命的障礙，這樣革命的障礙如果不自動的放棄和撤銷，怎樣能不禍國殃民，而且最後結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那就找不出有什麼合理的解決方法了」。罵得好痛快，大概肝火衝昏大腦了吧，其實指罵的那個「政黨」，何必老遠到「世界上」去找呢？只要不是數典忘祖、父，甚至連本人歷史也忘了的話，同盟會推翻滿清，國民黨反對北洋軍閥，不就是這樣的政黨麼？這一大串訓斥，好像重演西太后、宣統皇上、袁

大總統、段總理、吳上將軍之流的「盛世」，恭讀解散國民黨討伐孫中山的嚴諭，又好像寄居在「王道樂土」滿口詛咒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咆哮。滿清政府、北洋軍閥、日寇汪逆，都會說找不出什麼合理解決的方法了，甘心在反革命的死路上掙扎拚命，結果呢，失敗滅亡。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偉大政黨，他和人民大眾是血肉一體的，他和中華民族是利害一致的，他不怕任何反革命的威脅，也不怕任何反革命的誣毀，如果有人拿出所謂「合理方法」以外的「方法」來，人民就會把他踢得粉碎；如果拿出「封建割據」、「變相軍閥」、「障礙革命」、「破壞統一」、「妨碍建設」等等缺乏政治常識的謬言來，人民就會嗤之以鼻。

請問國民黨反動派，到底想革誰的命？想革中國人民之命？想革中華民族之命？如果不是，為什麼誠心發動內戰，難道中國全部淪陷才快意麼？難道十年內戰還不够慘麼？

## 五 幾個忠告

要組織一個龐大無比的特務黨，幻想在全國實行一個新專制主義，發動內戰，二年中消滅共產黨及一切進步的勢力和地區，這種「朕即國家」的荒謬思想，應該放棄！因為現在是反法西斯主義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時代了！

要「軍政時期就不能終結」，「憲政無法開始，訓政亦無從推行」，這一類反革命話頭，應該收起！因為人民早已拜讀過「五五憲法」，也親炙過保甲訓政，並不再存些什麼幻想了。軍政還是「終結」為妙，人民壓苦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豈不應了「佳兵不祥」的定論麼？

「人須知這並不是中國國民黨有什麼特殊的力量，而乃是時代與歷史的使命所造成的」，這種「我生不有命在天」的落伍思想應該放棄！須知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歷史使命決不會落到專制獨裁方面。「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滿清和北洋軍閥可以借鑒。

「雖然之」，凡是中國人，萬萬不可存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思想，從這種思想發生的言論，一定引起日本法西斯通訊機關同盟社發出這樣的聲明：「蔣介石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其論述之方向，那是沒有錯誤的；但由日本人觀之，它只是重複了已為帝國聲明脫盡了的太東亞新秩序論，迎合大亞細亞主義，抄襲汪精衛之『和平建國論』，天乎冤哉！一個堂堂中國國民黨總裁，抗日六年的領袖，反法西斯同盟四大強國的領袖之『所著』之本自認爲『革命』到了頂點的書，却被我們的敵人譽爲『方向沒有錯』，不過是『重複帝國聲明』與『抄襲汪精衛』，即使作者不害羞，國民黨人不知恥，中國人民是不能饒恕日本帝國主義這種侮辱的，中國人民有責任糾正自己隊伍中個別人們與個別集團的思想錯誤及行動錯誤，澈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共產黨人告訴日本帝國主義者，我們的方向：就是打倒你們，解放我們的民族，同時也解放日本人民，糾正我們民族中的一切缺陷、錯誤、污穢，同時就糾正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方向。中日兩國同時解放萬歲！」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新華社延安電）

## 「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

艾思奇

前，以蔣介石先生的名義出版的「中國之命運」裡，論到了幾個哲學問題。這些問題，蔣先生是當作「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來提出的，這就是說，蔣介石先生對這些問題的答覆，是全書裏所表白的一套政治思想的方法基礎。這一套政治見解和哲學思想，是以「國父」主義的名義為標榜的，這就是說，作者自認爲是繼承了孫中山先生真正的三民主義和「知難行易」的思想。但事實上是怎樣呢？事實是很可惜，在「中國之命運」裡並沒有真正的三民主義和知難行易的思想，而只有關於這些思想的一些空洞的名詞，以及在這些名詞裝飾下的中國式的買辦封建性的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學，和反對科學唯物主義、提倡迷信盲從的法西斯主義的唯心論哲學。

「中國之命運」裏的哲學思想，是一種極端不合理的唯心論。由於它的不合理，它和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思想真任何一點進步因素都是絕緣的。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上來看，孫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和科學的辯證法唯物論哲學是有很大距離的，它有着保守的唯心論的方面，但同時不能否認，它也有進步的唯物論方面。但在「中國之命運」裏，却完全拋棄了它的進步的唯物論的方面，並用種種附加的引伸，擴大了它的保守的唯心論的方面。下面就要說明：「中國之命運」裏有着怎樣一種極端不合理的唯心論，它是怎樣和中山先生「知難行易」思想中的進步因素「風馬牛不相及」。

## (一) 關於「誠」的思想

在「國民今後努力之方向及建國工作之重點」一節裡，蔣介石先生開頭就引用了孫中山先生的一段話：「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從這一唯心論的說教裡，「中國之命運」的作者蔣介石先生進一步的引伸出自己的許多論點，因此我們不妨從這裏談起。

……任何事情，任何主張計劃，只要「吾心信其可行」，就一定行得通嗎？拿事實來證明，恰恰就有無數相反的例子。秦始皇自以為皇位可以傳到萬世，因此自己叫做始皇，那信心可夠大了，但結果是第三世就歸於滅亡。墨索里尼要在意大利實行法西斯主義一千年，信心雖比秦始皇小一點，但看來也似容易些，結果只維持了二十一年，還算一切法西斯國家中壽命最長的。納粹的軍隊，會自稱是世界無敵的，的確有足夠的信心，但現在在蘇聯也算碰得頭破血流了。大後方的限價政策，在開始實行之前，據說是「成功之券，決可計日而至」的，但差不多一開始實行就失敗得一塌糊塗了。推而言之，就是「中國之命運」裡所宣傳的一套反民主的政治主張，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企圖，以及遼遠渺茫的「實業計劃」的諾言等等，雖然說得津津有味，好像眼前差不多實現了的樣子，但實際上也必終歸是夢想。謂予不信，請看將來的事實吧。

事實證明，信心並不能決定一切，同樣抱着信心去做的事，有的可以成功，有的必歸失敗。問題在於我們的主張和計劃的本身，在於信心的本身，有沒有可以成功的客觀條件。沒有一定的客觀條件，

即使抱着天大的信心去做，也不過是唐·吉訶德對風車的鬥爭，無結果的盲目冒險。什麼是那一定客觀條件呢？一般地說，就是廣大民衆（尤其是工農勞動人民）的物質生活發展的要求，就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合乎這些發展要求的事情、主張、計劃，加上人的主觀的努力，是可以成功的。違反了這些要求的行爲，無論主觀上如何有信心，終歸是要失敗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不否認「心」的重大作用。馬克思自己就說：「理論只要一掌握群眾，就立刻成爲物質的力量。」一年多來，我們在整風中間，學到了一個規律：「一切問題要從思想上來解決。」我們不否認思想對於工作的重大意義。但首先的問題是：我們的思想必須是正確的思想，必須是合乎廣大民衆的物質生活發展要求的思想，必須是合乎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思想。這種思想在實質上本來就是民衆自己的思想，不過被領導機關、領導者集中起來，將民衆分散的無系統的思想，變爲集中的有系統的思想。因此再把這種思想宣傳出去，就能夠爲廣大民衆樂意接受，通過他們的行動，發生偉大的實際力量，使工作能夠有很好的成效。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思想，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這樣一種思想。這種思想的正確性，爲中共二十二年來所實行的偉大革命事業所證明，爲抗戰以來的成果所證明，爲兩年以來實行三三制、生產運動、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軍擁政愛民運動與審查幹部的成功所證明。所謂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並不是說任何思想都可以解決問題，而是要掌握正確的、合乎中國具體情況的、合乎中國廣大民衆的要求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毛澤東的思想。這種思想之所以能夠有解決問題保證國爭勝利的力量，並不是單純由於思想本身的緣故，而是由於這種思想在中國社會上有堅強深厚的物質基礎，是中國實際國爭的反映。

我們唯物論者，對於任何一種思想，必須根據廣大民衆的物質生活發展要求，來檢查它的好壞。有些不合實際的思想，雖曾被誇張爲「如日月經天樣明白」。但如果把它拿到地上的民衆的行動中間

來考驗，它就會失敗得一塌糊塗。如果一個人在他的政治主張裏給民衆提出了很多好聽的空洞的諾言與計劃，而在他的實際行動上却給民衆帶來了窮困災難，那末，不管他的信心怎樣高，這種思想、這種主張和計劃之必然要破產，也正是『如日月經天樣明白』的。

『心』如果說『心爲萬事之源』，在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裡，有時還有某些接近合理的因素——當他把這『心』解釋爲『萬衆的心』，解釋爲『大群之需要』的時候，那裡面就有着某些可以接近唯物論的橋樑。那末，經過了『中國之命運』的作者蔣介石先生的引伸，附加上中國舊封建時代的『誠』的思想，那合理的因素就完全沒有了。蔣介石先生向『國民』要求說：『國民只須遵循主義，按照方略，順着成功的路線，窮理致知，實踐力行……所謂力行與致知，皆須出於至誠。』什麼是誠？乾脆地說，這裡之所謂誠也者，不外就是迷信的代名詞。廟宇的菩薩，都要向善男信女要求誠心誠意地去敬它。蔣介石先生說：『誠者成也』，『不誠無物』。又說：『不誠則天下無能成的事，至誠則天下無不成的事。』這是說，信仰可以決定一切。不管什麼思想，什麼主張，只要你誠心誠意，不問是非，硬幹下去，蔣先生都可以爲你寫一張包票：『一定成功！』這樣一種見解的錯誤，這種包票之不可靠，只要根據前面所說的一切，就很容易明白。

唯心論的『不誠無物』，是完全不對的。在事實上，在唯物論者看來，第一個命題是『無物不誠』。第二個命題方可提出『不誠無物』。任何精神、思想、志願、信心、如果沒有客觀物質基礎，就一切都是空談。因爲物質是本源的、第一位的，精神（誠），是派生的、第二位的。只有具備了充分物質基礎的精神（誠），才有成功的希望。我們唯物論者的思想日程與工作日程是：一，『無物不誠』，必須使自己的『一切思想意識，都符合於客觀實際，都符合於廣大民衆的政治經濟要求；二，『不誠無物』，將我們的正確的思想意識，堅持下去，絕不動搖，絕不灰心喪志，一定要達到民族解放與

社會解放的完全成功。我們的唯物論哲學是與蔣介石先生的唯心論哲學完全相反的。

對於一切唯心論的東西，我們還可以提出和蔣介石先生完全相反的證明。「不誠有物」，「誠則無物」——對於法西斯主義就是這樣。法西斯主義者以「國家」「民族」的名義來欺騙青年，沒有經驗的青年們都萬分真誠地爲他們犧牲了，有什麼「物」可得呢？以德國的例子來說，成百萬成千萬的青年變成了砲灰，德國「民族」「國家」所得到的除了巨大的災難又有什麼？倘若德國的青年不受納粹黨的欺騙，對希特勒沒有那樣大的誠心，無數青年的生命又何至於變爲無物，德國民族的災難又何至於如此深重呢？在這樣的意義上說，「不誠」反而可以「有物」。問題的關鍵是在於：法西斯主義者自己的一「誠」是沒有物質基礎的，是違背客觀要求的錯誤思想；法西斯的欺騙宣傳，本來是違背社會經濟發展潮流的。法西斯主義者的目的，只是要把極少數最大最大的地主資產階級喂得更肥，而對於大多數民衆，對於國家民族，並打算真正貢獻任何一點東西。相反，只是下決心壓迫民衆，剝削民衆。他們口口聲聲講「至誠」，並不是他們自己真正有什麼爲國家爲民族的誠意，而只是爲着要求民衆和青年們誠心誠意地像羊一樣地受他們愚弄，只是爲着要得到受騙者的「至誠」。對於這樣一些騙子表示誠意，自然要一切落空，在這種情形下，「誠則無物」是必然的。因此，站在廣大民衆的立場上，站在青年的前途和幸福立場上，對於任何人的任何一種思想主張，都要看一看它在實際上做的結果怎樣，而不要只聽他說得怎樣。我們的哲學首先是「無物不誠」，如果你對於國家民族的任何意見沒有科學的客觀物質條件，對於廣大勞苦人民（他們是國家民族的真正代表者）以及青年（他們是國家民族將來的主人）的現狀與前途沒有真正的「物」的貢獻，那我們就說：這證明你的所謂「誠意」是空的，是假的，是騙人的；而我們也就不能那麼便宜地對你拋出自己的一片誠心了。

唯心論和宗教是相通的，「誠」字在中國的運用，本來就是一個迷信的符號。我們的許多寺廟，

許多測字攤上，常常掛着「誠則靈」的招牌，求神問卦的人，必須恭恭敬敬，把紙燭貢品，和自己血汗換來的金錢送給和尚道士，以表自己的誠心。至於這樣表示之後，是福是禍，仍要靠你自己的運氣，和尚道士是管不着的。如果有禍，只算你自己倒霉，不必問爲什麼。若一定要問爲什麼，那反而要給你加上一個罪名：「不誠」。在「誠則靈」的號召之下，實際的結果，只是要無數青年信女節衣縮食，把少數寄生的和尚道士養得更肥更肥。蔣介石先生也有一塊「誠則靈」的招牌，其作用正和和尚道士的招牌一樣，不過是勒索貢品的幌子罷了。

法西斯主義者的唯心論的哲學，原來是一張空頭支票。它所以要對「國民」發出這張「誠」字號的空洞精神說教的支票，就因爲它沒有任何物質的準備金付給廣大民衆，尤其是工農勞動人民。試就「中國之命運」裡對「國民」所允諾的「三民主義」來看，實際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就民族主義來說，誰不知道當前的大問題是日本帝國主義強盜還在我們的國土上橫行着，而蔣介石先生對這事却好像滿不在乎，反而對「國民」說：「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就民權主義來說，蔣介石先生沒有一個字提到要給全國人民以民主權利，却公然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就民生主義來說，孫中山先生所常常關心的中國民生的最大問題：「耕者有其田」，以及大後方眼前迫切要解決的（或者說早就應該解決的）改善工農勞動人民生活的問題，蔣介石先生是一字不提，却長篇大論地修談着三十年五十年以後的「實業計劃」，也不怕有人要問：眼前的民生問題尙且解決不了，三五十年後的遙遠計劃又有什麼途徑能夠實現呢？如果眼前的人民都餓死了，如果抗戰不幸失敗了，三五十年以後還有誰來建國，還來建誰的國呢？

蔣介石先生主張建國工作必須從心理建設開始。在他所舉的五個要目——心理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中，他認爲「心理建設與倫理建設，實爲各項建設的起點」，而

把政治與經濟建設放在程序的最後一步。這一個唯心史觀的顛倒程序的意義，就是要把物質的諾言推到渺茫的將來，同時又夢想用這空洞諾言來喚取國民今天的愚忠。『必須改變國民過去消極和被動的心理。與提高國民對國家和民族的道德。』這種說法，完全是似是而非的。如果所謂『國民』，是指全中國廣大的民衆（以工農佔大多數）而言，那末，他們對於國家民族的心理，倒並不是那樣消極和被動的，他們的道德，比起少數達官巨富來，是高尚得不可比較的。現在的問題並不是國民的心理需要達官巨富們來改變，國民的道德需要達官巨富們來提高。現在的問題是大後方的腐敗政治和經濟剝削打擊了廣大民衆的抗戰積極性，壓抑了廣大民衆對國家民族的高尚道德的發揮。所以現在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恰恰不在於『心理建設』，『倫理建設』，而在於怎樣打破大後方那種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壟斷下的破產經濟和腐敗政治，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只有這樣來解決問題，民衆對抗戰建國的積極性才會發揮出來，人民對於國家民族的高尚道德才能充分表現出來。這並不是空論，而是事實。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及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就是活的例子。

所以，從廣大人民的階級立場看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制主義者以其唯心觀點來責備『國民』的心理『消極』、『被動』，責備他們對國家和民族道德不夠，說需要『改變』、『提高』，完全是無的放矢。但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制主義者的階級立場來說，提出這樣的問題來，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從統治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看來，國家民族就是他們自己，不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民利益代表國家民族利益，而是他們百分之一以下的人的利益代表國家民族利益。他們責備『國民』，是因為大多數人民爲他們少數人利益的犧牲、擁護始終是消極和被動的，而不是因爲『國民』對抗戰建國事業被動和消極。他們所要提高的道德，乃是大多數人『誠心誠意』給少數人欺騙愚弄的道德，而不是因爲民衆真正缺少對國家民族的道德。蔣介石先生關於心理建設的問題的提法，在事實上就只有

這樣一個解釋，而蔣介石先生自己對於大後方的政治經濟統治的實際情況，又證明的確只有這樣一個解釋。

總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所以要宣傳唯心論的哲學，就因為他們需要把一切道理加以顛倒，把一切事實加以蒙混，而唯心論正符合了他們的這個需要。唯心論就是不顧客觀事實的空論，所以它可以用把白的看做黑的，好的講成壞的。不過爲要普遍宣傳唯心論，壓制唯物論，首先還得要一個物（基礎，就是用一切手段剝奪人民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在物質上壟斷了政權，在思想上也就壟斷了思想。仗着權力，把道理都佔到自己一方面，一個聲明，投敵叛國的軍官就被渲染成抗日英雄，一紙「軍令」，就可以把堅決抗戰的軍隊誣作「叛軍」。明明是窺敗政治摧毀了民衆的抗戰積極性，却說「國民」對國家民族的道德不够高尚。嘴上說「公」，實際上是借此爲私。嘴上說要「不知有私」，要打破「個人利己主義」，而反對的鋒芒却是向着真正公忠體國的抗日黨派和廣大民衆。「國家」「民族」是少數人壟斷的，所以「公」也是少數人壟斷的。不適合於這統治的少數達官巨富的利益的事，就叫做「不公」，真正爲全民族大多數人謀利益的事，就被認爲是「私」。這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我們領教得太多了，中國的人民，受蒙蔽也不會太久了。中國人民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也有了自已的一部分物質保障，這就是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存在。所以唯心論的壟斷，在中國境內已不能絕對橫行，若論唯心論的將來結果，那也只能是唯心論的幻想罷了。

## （二）關於「知」與「行」的思想

「中國之命運」裏宣傳着反理性的唯心論哲學。在「誠」的名義下，蔣介石先生提高了信仰和迷

信，貶低了科學的客觀知識。蔣介石先生對於知識來源的見解，就是明顯的證明。依蔣介石先生的意見，知識不是來自客觀事物規律的反映，而是來自人類生來的本性。「知的本源在於人類的本性，不必外求。」——就表面說，我們求知，要接受民族的經驗和教訓，要學習外國的科學和技術。然而就實質上說，知識如果「無得於己」，便不能算是真知。」

何等荒謬。何等腐朽的唯心論！居然可以把民族鬥爭經驗教訓所證明的知識和科學技術知識都叫做「表面」的知識，而把人的所謂「本性」裏的一種莫明其妙的什麼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蔣介石先生沒有說清楚），當做所謂「真知」。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竟來宣傳這種反科學的思想，除了法西斯主義的狂言囈語之外，是找不到它的任何比擬的。請看已經滾蛋了的法西斯老祖宗墨索里尼怎樣說：

「法西斯主義是宗教的概念，人們把握它不是用內在的知覺的報告的觀點，而是依據至高無上的信條的觀點，用客觀意志的觀點，它引導個人提高，使他自覺自己是精神界的一員。」

試問這裏所說的一切，和「中國之命運」裏的見解有什麼本質上的分別？法西斯主義的知識論，就是要破壞科學的合理的知識，對人民灌輸一種神秘的宗教信仰。漢奸周佛海還未公開投敵的時候說：「相信主義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做到盲從的程度。」「中國之命運」裡所謂出自「人類的本性」的「真知」，除了把它看做這種盲目的信仰與盲目的服從之外，是找不到別的解釋的；因為宅把經驗的科學的知識都降低到「表面」知識的地位；試問世界上除了實際經驗所證明的知識，除了科學知識之外，還有什麼真正合理的知識？輕視這種知識，就是輕視理性，反對真理。所以，「中國之命運」裡所說的「真知」，實際上是等於「無知」；而蔣介石先生在「真知」的名義下向「國民」要求的，只是糊里糊塗的盲目信仰與盲目服從，渾渾噩噩的跟着腐朽到頂點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

去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冒險，藉以維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黨專政的中國式法西斯主義的統治，中國境內蔣介石輩一切反動的唯心論宣傳，其真正的目的全在於此。

舉例來說，蔣介石先生對於有些革命先烈的英勇犧牲精神所給與的讚揚和解釋，就包含着這樣的意義：

「爲什麼清末民初革命的先烈，能够赴湯蹈火，視死如歸呢？他們篤信只有革命纔可以救國救民，他們就力行革命工作，死生榮辱，置於度外。他們的「知」本於天性，他們的「行」發於真知，纔造成推翻三千多年君主政體與二百多年滿清專制的偉大事業。」

這裏包含着以下的見解：第一，所謂「本於天性」的「真知」，就不外是能「篤信」。第二，革命先烈之所以赴湯蹈火，視死如歸，就是由於有了這種「真知」。第三，只憑着這種「真知」，就能够完成偉大的事業。這些見解，是對於革命先烈的犧牲精神片面的讚揚，而對於他們의思想和事業，不給與任何忠實的客觀的估計。不錯，對於每一個時代的真正革命者的英勇犧牲精神，我們是應該讚揚、應該學習的。但作爲一個現在的革命者的我們，作爲歷史上一切革命事業的真正繼承者的我們，對以往的革命者所首先應該關心和研究的，是他們的具體的思想和事業，是他們的正確和錯誤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先烈們的犧牲精神是一回事，他們對革命的認識是否能達到了絕對的「真知」，又是一回事。除非人類的思想永遠不會進步，否則我們就要忠實的承認，過去的革命者，由於時代的限制，他們對於革命的認識，是有限制的。尤其是在馬克思主義者以前的革命者，由於沒有完全的科學方法，只憑形式邏輯或經驗主義看問題，他們對於革命的認識是常常有不够或錯誤的。以孫中山先生自己的例子來說，在國民黨改組時他就承認過去革命方法的不對，如果說他的「知難」學說有進步意義，那意義就在這裡。真正有革命良心的人，應該學習孫中山先生的榜樣。所以，對於革命

事業能够「篤信」，並不等於所「篤信」的就全是「真知」，而能够篤信，能够「赴湯蹈火」，「視死如歸」，也並不就能保證事業一定成功。要保證事業成功，不是僅僅靠空洞的「篤信」就能够奏效的，第一，要有正確、完全的認識作爲指南。第二，要在這正確、完全的認識上建立我們堅強的信心，或所謂「篤信」；就這一點來說，我們的信心，或「篤信」，和正確、完全的認識是一致的，是分不開的。第三，要有群眾的力量——物質的力量作基礎，要通過群眾的革命鬥爭來推行我們的事業，才能保證成功，這些就是我們唯物論者的了解。辛亥革命推翻了三千多年的君主政體，與二百多年滿清專制，這自然是一大成績，但民主革命並沒有成功，中國的半殖民地制度與半封建制度並沒有被推翻。這一方面固然也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由於先烈們對革命的認識不夠，而這認識不夠，是包括當時孫中山先生自己在內的。中山先生始終以爲辛亥革命已經是「破壞的革命」的成功，而沒有看到，就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來說，辛亥革命的破壞是根本沒有成功的，這一個不正確的認識，不正是使中山先生的活動始終束縛在軍人政客圈子裏，不能與真正革命的群眾相結合，而一直到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前，總是在自己陣營裏碰釘子的原因嗎？

把「篤信」當做「真知」，用信仰代替知識，以先烈的犧牲精神作爲神聖的崇拜的偶像，不學習他們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這不是尊重先烈，而是想利用先烈的白骨，來騙取青年的熱血和頭顱，好使青年們跟着買辦封建性的法西斯主義者去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冒險，藉以維持國人皆曰可廢、天下人皆曰可廢的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腐敗統治，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這裏已轉到了「行」的問題，蔣介石先生對「行」是非常看重的，蔣介石先生自己並認爲是在倡導着「力行哲學」。有時甚至於把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奪去一半，簡單地稱做「國父的「行易」哲學」。什麼是「行」？如果只滿足於字面上的解釋，那末蔣介石先生也曾答覆你說是「革命

工作」的「力行」。但就實際上來看，蔣介石先生所謂的「力行」和真正的革命的實踐，是根本不同的。第一，蔣介石先生所要求的「力行」，如前面說過的，是憑藉着「誠」，憑藉着所謂出於「本性」的「真知」。憑藉着對於「主義」，對於「領袖」，對於先烈，對於「國父」的偶像化的信仰，那就是宗教式的崇神行爲。這是反動的行爲，而不是真正革命的行爲。真正革命的行爲，必須有科學的客觀規律知識爲指導，必須具體而深刻地了解周圍的實際情況，必須正確地認識民衆，尤其工農勞苦民衆的希望和要求，必須和廣大人民在一起，依照着地上的現實的人民所要求的方向，而不是依照着任何偶像化了的個別人物的要求和他們所謂「如日月經天一樣」的什麼「主義」去行動。其次，與上面相關聯，蔣介石先生所要求的「力行」，是盲從的行爲，是要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想把封建時代愚民政策的統治施行到今天，所不同的，是曲解和利用了「科學方法」的名義。蔣介石先生說：「依照科學方法，每一個人的工作，必遵循分工專職的原理。知者與行者雖有合作的必要，然仍須分工。」這就是說，知者不一定要力行，而行者也不必要有知。這也叫做科學方法麼？真是冤枉了科學方法！實際上正是按照科學方法，每一個人的工作雖然有分工專職，而每一個人對於他自己所專的一部分職務，必須具有正確的完全的知識，同時對於整個工作也要具有一般的正確知識，否則就無從完滿地担負起自己的分工專職。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決不能讓一些無知無識的人例如達官巨富們來幹。革命工作裏領導者與被領導者固然是「一種分工」，然而這種分工決不是知者與不知者的分工，領導者指示總的鬥爭方向，被領導者也必須善於領會這個方向，並把它正確地應用到自己所處的具體情況裡。在這一方面說，被領導者的「知」，常常比領導者還需要更加具體，不則是不能完成任務的。再次，蔣介石先生所要求於「國民」的「力行」，不是破壞舊社會建立新世界的真正進步革命的行爲，而是保守舊社會、遵循既有秩序的行爲，這只要看蔣介石先生反覆稱讚孔子的「六藝教育」，「要學者從六藝的

實行得到真知，要學習孔子一流的「禮、樂、射、御、書、數」，就可以明白。在革命的時代來宣傳孔子一流的「六藝教育」，要國民學習封建時代統治者所崇尚的行爲，試問這有一絲一毫的革命氣味沒有呢？

總而言之，「中國之命運」的哲學是愚民哲學，在「真知」的名義下要求人民無知，在「力行」的名義下要求人民盲從。我們應該反對這種欺騙人民的極端有害的哲學，我們應該揭破它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買辦性的法西斯主義的真面目！

### (三) 關於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思想

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思想，和蔣介石先生的所謂「力行哲學」，是有根本不同之點的。「力行哲學」是反革命的反理性的愚民哲學，而中山先生的思想則有進步的方面，有合乎科學和理性的方面。在某一方面說，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思想，是反映着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一些真實情況的。

中國革命，由於它的特殊條件，經過了一個複雜的、長期的過程，這種客觀過程，反映在人的認識上，反映在中國革命者對於革命規律知識的掌握上，也就表現爲一個長期的摸索和試驗的過程。爲着這摸索和試驗，中華民族曾付出了它的千萬優秀兒女的頭顱和鮮血。毛澤東同志說：「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圖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這是中國革命認識上的最真實的情形。

中國的革命，是在帝國主義國家侵略刺激之下發展起來的。中國的被侵略，是由於中國本身的落後。封建社會的萬里長城，抵擋不了資本主義的洋槍大砲。舊封建社會統治者的思想文化，不僅便利

於滿清的異族統治，更便利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支配。爲着挽救中國的危亡，中國必須進步，中國革命中的志士仁人必須從先進國家學取進步的革命思想學說，並善於應用之於自己國家的具體情況中。因此，在認識過程上，一方面要依據自己民族的鬥爭經驗和具體國情的認識，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先進國家的革命思想學說；這就表現爲外國的先進革命理論與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從太平天國採用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起，到「五四」以後，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爲止，思想上的摸索過程，和革命的發展過程，是互相照應的。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這一個最好的真理，作爲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武器……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爲之一新。」（毛澤東）

這一個思想上的摸索過程，也曾是長期的、艱難的，但這種艱難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已經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下，找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了。雖然在我到這條路以前，中國民族會經過了不知多少的失敗和痛苦。

孫中山先生親身經歷了這艱難苦痛的過程。他比他以前和同時的革命者都偉大的地方，就在於能夠自覺到摸索的艱難，因此也就能够不斷地向前進步，能够「以俄爲師」，探求新的革命方法，拋棄舊的方法，不停止在固定的一點。他在實際行動中，幾次和舊資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的妥協保守的傾向鬥爭（辛亥以前反對立憲派，辛亥以後反對和袁世凱北洋軍閥妥協，十三年改組國民黨又反對西山會議派）。在思想上，能够和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已經腐朽已經過時的公式作鬥爭，在屢次試驗失敗之後，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之下，毅然採取了新三民主義即新民主主義的方法。

中山先生之提出「知難」的思想，是表明他能够自覺地認識到把握中國革命規律知識之艱難。就

在這一點上，他的思想是有着進步的唯物論的因素的，是合乎中國的客觀實際，合乎科學和理性的。就在這一點上，有着孫中山先生對於新事物新知識的不斷追求嚮往的精神，有着在行動上不妥協不灰心喪氣的堅毅的精神，這是他以前和同時的一切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家都不能比較的。

孫中山先生說：「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識要隨事物之增加，而同時進步，否則漸即於老朽頹唐，靈明日細，是以智之反而則爲蠢，爲愚。」（軍人精神教育）。這是一種樸素的唯物論思想，這種思想說明人的「知識」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不是如蔣介石先生所說，出自什麼神秘的「人的本性」。這種思想，說明人類的認識要跟着事物的發展而不斷發展，不能停止於任何一個舊的立腳點。「孫文學說」關於「十事」的論證裡，也流露着這一種發展的思想。這是中山先生的思想的精華，是使中山先生能够在政治上從舊三民主義走向新三民主義的方法基礎。既然蔣介石先生口口聲聲說要「遵奉國父遺教，繼承遺志」，那就要首先懂得這一個最重要的遺教和遺志。否則就是口頭上的信徒，實際上的叛逆！

這是「知難行易」學說裡的進步精神。但我們應該看到，這一個「學說」，是五四運動以前中山先生對於自己革命鬥爭經驗的總結。在時代上，它是中國的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一個構成部分，它本身基本上沒有超出舊資產階級啓蒙哲學的範圍。它具備着啓蒙哲學的進步方面，那就是對於世界的一般唯物論的理解，對於科學的客觀的合理知識的重視。但它同時也有啓蒙哲學的弱點，那就是對於社會和革命的認識，不能貫徹唯物論的觀點，而依然是唯心論的觀點。

中山先生不能從物質的經濟的基礎上去看社會的變化，不能依據社會階級關係的分析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因此，他對於自己的革命經驗的總結是錯誤的。第一，說辛亥革命在破壞方面已經成功，却不知道，辛亥以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經濟基礎既然根本沒有推翻，所以革命對舊社會的破

壞也並沒有成功。第二、說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失敗。其原因單純地在於人的「心」中，單純地在於「知與不知」之故。却不知道，辛亥以後革命之所以仍然不成功的基本原因。是由於沒有找到堅強的革命階級作爲基本的動力，是由於革命營壘的活動依靠了一些反動階級的軍人政客和這些傢伙之背叛革命，是由於沒有找到反映廣大人民要求的反帝反封建的明確的革命綱領，是由於舊民主主義的方法與綱領已經過時，已經無力，並不是由於人們「不知」這一套舊方法舊綱領。這一點，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完全證明了。

知難的思想也有消極的一面，過分誇大這困難，於是得出結論，認爲廣大羣衆與知識無緣，只有少數貴族能獲得正確知識。其實，本質地說來，正是與此相反。孫中山先生摸索到中國革命「必須喚起民衆」的道路確是很困難的，甚至直到國民黨改組以後，孫先生也還是常常動搖。這正是孫先生本人在歷史上長久地自居先知先覺，而視民衆爲不知不覺，與他們「覺地相脫離相隔絕的緣故。中國的廣大農民，不但在知道中國需要土地革命、需要民主政權、需要抗日戰爭的問題上，並沒有像許多的大人先生們所經歷的那樣困難，即在學會分田查田，學會自己辦事，學會放槍打游擊的問題上，也沒有像許多大人先生所斷定的那樣困難。應該公平地說，只有羣衆才是真正的先知先覺者，聯系羣衆的領導者，集中了羣衆的經驗，在這一點上說來，實在是後知後覺者，而脫離羣衆的所謂領導者，則是不折不扣的不知不覺者。孫先生在這一方面的錯誤見解，就是把領導者看成脫離羣衆的天生的聖賢才智，而把羣衆看成盲目無知、平庸愚劣、只能閉着眼睛跟領導者走的「阿斗」。因爲這一些基本觀點的錯誤，就產生了孫先生所謂的「真平等」、「假平等」、「權能分開」、「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等一聯串的錯誤觀點。三民主義之所以能被法西斯主義者和漢奸法西斯衛道所利用，這正是主要原因之一。孫中山先生不知道這樣的唯物辯證法：革命領導者是羣衆的學生，又是他們的先生。領導者只有

從人民學習，才能體會人民的思想、感情、要求，這就是給人民當學生，領導者將人民內分散的、無系統的思想、感情、要求總合起來，化零集中的有系統的理论、綱領、方針、政策、辦法，再拿了去向人民作宣傳，並使之見於行動，這就是向人民當先生。孫中山先生強調當先生的一面，不知當學生的一面，所以變成了唯心論的見解。

「知難行易」學說的這一弱點，就使孫中山先生對於知行問題解決得不正確。知首先是行的反映，其次是行的指導，同時又須受行的考驗，這是孫先生所不曾了解的。孫先生把感性的知與理性的知混爲一談，又不知道感性的知正是理性的知之基礎，於是把知與行完全對立、完全隔離起來，講了一大堆「不知亦能行」、「能知必能行」等不符合於事實的玄學。孫先生這種二元論的和唯心論的解釋，不僅使後來蔣介石先生的法西斯化的愚民哲學得到了一個根據，並且使一切食言而肥的諾言專家們得了一個護符。

這些就是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的弱點。這些弱點，當中山先生與共產黨人合作，並且採取了革命行動的新方法以後，是在許多具體的問題上都克服了的。例如在改組國民黨的時候，中山先生檢討過去的失敗經驗，已不再認爲是革命黨人「不知」的緣故，而是依照了「俄國有個革命同志」的說法，認爲是國民黨內有反革命分子「能乘隙以入」、「卒至破壞革命事業」的緣故，又在他臨終不久以前的「喚起民衆」的主張，以及希望「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則是把劃分建國爲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阿斗」主義的思想取消了。

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裡，完全抹煞了中山先生思想上的這一個進步，盡量利用和擴大了他的舊的弱點。這樣，藉着中山先生「行易」哲學的名義，來製作一套極不合理的、唯心論的、鼓勵盲從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中國式法西斯主義的愚民哲學。

只有當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應用到中國來之後，中山先生的舊民主主義啓蒙哲學對中國社會中國革命的認識上的唯心論的弱點，才完全克服了。根據歷史唯物論的科學方法，中國共產黨指出革命不成功的原因是由於與帝國主義相結合的封建制度仍然存在，因此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推翻中國封建剝削制度的主張綱領。中山先生領導下改組後的國民黨也接受了這綱領，使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充實了新的內容。又根據中國革命所處的條件，中國共產黨指出，中國的資產階級已不能成爲單獨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堅強的力量，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必須首先依靠工農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力量，尤其是依靠工人階級和它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山先生接受了這一個思想的某些要點，在改組國民黨後規定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使中國的民主革命、使三民主義的實現，獲得了真正堅強有力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這結合的過程，是根據了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和中國工農羣衆、廣大人民的鬥爭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和廣大人民在一起，發動人民積極鬥爭的精神，並以「甘當小學生」的態度，從羣衆中學習領導革命的知識。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領導者決不以唯心主義的「先知先覺」自居，決不把人民簡單地看做不知不覺的「阿斗」，相反地，共產黨人知道廣大人民羣衆的偉大的積極性與創造力，只有他們，只有人民才是一切革命的真正主人翁。同時共產黨人又知道，人民由於長期處在反動統治下面，造成了文化落後，而人民的意見與力量又是分散的不集中的，所以人民迫切需要自己的政黨，自己的領袖，自己的先鋒隊。這種政黨、領袖、先鋒隊不是高踞人民之上，而是處在人民之中，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向人民學習，又教育人民。這樣的政黨、領袖、先鋒隊，就是中國共產黨。因此，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掌握真正適合中國國情的理論知識，才能自誕生以來領導中國人民連續不斷地進行了三次驚天動地的革命事

業，才能堅持抗戰到今天，並在各根據地建立了真正新的三民主義的中國。

這一切事業和思想，都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名字分不開。到了今天，鐵的事實已經證明，只有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了和具體化了的辯證法唯物論，才是能够把中國之命運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學的哲學，才是人民的革命的哲學。

（一九四三年八月）

## 駁蔣介石的文化觀

齊 燕 銘

蔣介石先生在中國抗戰將滿六周年的時候寫了一本書——「中國之命運」。這裏面對於中國文化特別強調所謂「中國民族固有的文化」、「中華民族固有德性」、「中國文化固有的系統」。這種思想走蔣介石先生哲學的一個重要部分，而且實際上也就代表着抗戰以來國民黨文化政策的總結及今後國民黨文化政策的總方向。

任何人都會了解：今天中國的革命文化，是人民大眾反抗日本法西斯強盜侵略戰爭的文化，而不是其他；現在居然有人高唱什麼「中國固有文化」，按其實際又只是中國化了的法西斯主義的文化，而且這種論調竟出於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這就不能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關係中國之命運的大問題，使人不能緘默的問題；我願在此提出我的意見。

### (一)

「一定的文化（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於一定的社會的政治經濟。」（毛澤東同志）社會的歷史是一部新的生產關係代替舊的生產關係的歷史，也就是新舊社會鬥爭的歷史，隨着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於是發生了新舊文化的鬥爭。

大只說們並不抹殺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的優良傳統。在五四時代對於中國舊文化一切否定的態度，僅在其次的歷史條件下有其進步的意義。而在今日，我們對於中國這樣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文化的認識，為應該接受數千年來民族繁榮創造的豐富無窮的成果。『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而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毛澤東）這將它變為新文化的組成部分，以服務於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與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偉大事業。這是我們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根本態度。

我們從中國的古史到近世史，曾經有過無數為民族爭生存堅持反抗異族侵略的民族英雄，有過無數為歷史求進步，為人民自由而進行反專制鬥爭的革命者，有過無數在學術理論戰線上進行反對獨裁專制，反對黑暗愚昧，迷信的思想家，有過無數在科學技術上貢獻了前進人類幸福的發明家。這些一切都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一定要發揚和相反地，而另外，也有不少暴君奸臣，國賊特務走狗之流，進行着破壞民族利益的勾當，這和壓迫屠殺人民阻礙社會進步的罪行，是他們是中國文化的黑暗面。中華民族正是由於有這這羣敗類，而曾無數次的陷於危亡災難和痛苦。我們對於這種中國文化的惡劣傳統，一定要予以打擊消滅，使這永遠不得翻身。

我們對於中國文化只有這樣理解，才是合乎歷史實際的科學了解。只有這樣批判地接受中國固有文化，才能有利於中華民族的解放和自由，才能與人民大眾的利益一致。

我們根據這個標準來看「中國固有文化」一書是怎樣地構成所謂「中國固有文化」的理論和其怎樣的體現了中國化的法西斯主義的實質。

「中國之命運」上面說：

「這一部悠久的歷史基於中華民族固有的德性，復發揚中華民族崇高的文化，我們知道中國國民道德的教條，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中國立國的綱維爲禮義廉恥……。」（頁九）

及說：

「以吾民族固有精神，則中國智仁勇三達德及其所以行此達德的誠字，實爲我民族德性的結晶。」（頁一三三）

在這裡所說崇高的文化其最基本的東西只是些種象的超物質的空洞的德性。

實際說來：德性，也是一定社會政治經濟的產物。數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及其他御用的學者會是不斷的以抽象的神秘的教條、聖潔的格言掩飾其階級剝削的實質。「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謂也。「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之謂孝。在具體的歷史意義上來解釋，忠孝云者，不過是國與家的統治者（君、父）對於被統治者（臣、子）的要求的一種絕對服從的義務。「仁者愛人」豈不是絕佳的德性？但依孔子解釋：仁者是要「克己復禮」，而禮則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封建秩序。可是任何抽象的道德教條在封建社會裡便有適合於封建秩序的剝削內容，因此對於這些產生於封建社會會作爲封建統治工具的道德教條，如「四維」、「八德」之類，只有給予歷史的批判，賦予革命的民主的具體內容，才能成爲合乎當前民族利益的美德，否則仍將爲反革命利用作爲壓迫人民的武器與背叛民族利益的橋樑。

即以所謂三達德（智、仁、勇）而論，翻成白話不過是聰明、仁愛、勇敢而已。任何人也不會反對聰明、仁愛和勇敢。只是我們要問：你的聰明是用於打垮法西斯強盜爲人民大眾謀幸福呢？還是用之於壓迫大眾？你的仁愛是施於被敵蹂躪的荒饑饉饉難民呢？你的勇敢是施於被敵蹂躪的荒饑饉饉難民呢？你的聰明是施於被敵蹂躪的荒饑饉饉難民呢？你的仁愛是施於被敵蹂躪的荒饑饉饉難民呢？你的勇敢是施於被敵蹂躪的荒饑饉饉難民呢？

失所的千萬萬同胞呢？還是施之於投敵叛國黨軍大員的民族敗類呢？你的勇敢是表現於對日本法西斯強盜作戰上呢？還是表現於進攻抗日民主政治的邊區和解決堅持敵後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上面呢？——前者與後者，是愛國與賣國，抗日與漢奸的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但智仁勇的德性並不能作為何去何從的標準，相反地只有抗日團結民主才能作為智仁勇德性的標準。

「中國之命運」的作者蔣介石所說作為中華民族固有文化的基本的德性只是中國過去封建社會作為封建統治工具的所謂「德性」。這種抽象地籠統地不加批判地離開當前革命鬥爭的實際而談「民族固有的德性」、「中國固有的文化」，實質上就是企圖以空洞的概念來掩護叛變民族利益的內容，是企圖以德性的美名來玩弄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戲法。事實的表現就是：以實行三民主義為「封建割據」，以民主自由為「個人私慾」，以反共磨擦解散共產黨為「精誠團結」，以宣佈抗日的新四軍為「叛軍」而對叛國投敵的國民黨二十位中委三十三將領曲予原有為「至誠至公」！在這裏我們發現中國固有文化中最壞的德性。

### (三)

「中國之命運」的作者蔣介石對於中國固有文化極力強調它善於融和其他民族的作用：

「能以我悠久博大的文化，融和四鄰的宗教。」（頁五）

並且這種「悠久博大」的文化還「自有其固有的系統」，「中國能夠吸收各種文化和學術而融會貫通，就是以這個固有系統為中心的。」（頁七〇）

中國歷史在鴉片戰爭以前長期停滯在封建社會的階段，因而封建文化也是長期的統治着中國的歷

史。這裏所謂「悠久博大的文化」實際也就是中國封建文化的「雅稱」。

其實的確，在中國歷史上，漢族以及其他許多民族由於同居域內在經濟文化上相互影響而有同化的事實；的確，也由於漢代在經濟與文化上比較先進而使許多民族會接受了漢族的文化。但不可忽略的是在其間還存在殘酷的戰爭。

即如北方游牧民族會數次以強大的武力壓略和統治了中國的額生一部或全部，在這上面會以中國文化來統治中國人民，所謂「苻秦與元魏雖統一黃河流域……莫不襲中國的衣冠，行中國的政教」（頁三）「他們（契丹女真）雖先後入據中原，然他們仍先後浸潤於中原的文化之中」（頁四）等歷史的裡面，還存在中國人民在異族奴役下的慘痛的事實，還存在中國人民反抗奴役的民族戰爭的事實，雖然這些民族在中國居住既久逐漸漢化，這是由於漢族經濟文化比較先進而又經過殘酷戰爭的結果，與什麼「融和四鄰的德性」是毫不相干的。

「中國之命運」的作者蔣介石在這裏不但曲解了中國的歷史，而且掩蓋一部歷史的真實，來指定中華民族文化的特點是善於「融和」，所謂「融和的動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頁二）那只是閉目不覓事實的謬論。

其實這已是老一套了，在抗戰以前，日寇加緊侵略的時節，以汪精衛為代表阻礙第五縱隊的民族敗類們已經高唱過民族同化的論調，以掩蓋他們妥協投降的罪行，為不抵抗主義做理論根據。並且事實上，在人家武力侵略，我們「文化融和」之下斷送了不少的國土了，這都是彰明昭著的歷史慘痛的經驗。汪精衛等不足怪，現在蔣先生居然也將這種已經欺人無效的歪調筆之於書，著之於「中國之命運」的宗明義第一章，豈非囋囋怪事！

(四)

「中國之命運」的作者蔣介石不但澈頭澈尾的擁護着封建文化（所謂「中國固有文化」），而且對於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所謂「固有的社會組織」）也致以心嚮神往的讚美：

「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在血統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而保甲而鄉社。由個人日常生活的箴規，推而至於家，則有家訓；由家訓而推而至於族，有族譜；有族規。在保甲有保約；在鄉社則有鄉約和社規。其自治的精神，可以舉修齊的養效而不待法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謀公眾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則有鄉校和社學；言賑濟則有義田和義莊；言積穀備荒則有社倉的儲蓄；言防盜緝奸則有保甲的連坐，乃至堤防溝洫道路河川無不由鄉社的財力以從事於修築和疏濬。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謂「講序之教」，兼之以素弟之義，禮運所謂「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常活躍於中國固有的實社會之中，而表現其具體的成績。」（頁六）

這一大段對中國封建社會美羅幻景的描寫，我雖不去一一談論，總括來說，這裡是把儒家所說封建社會理想的標準當做歷史的事實，而把真正歷史事實中的農民遭受殘酷的剝削，更不編書的蝗旱歉荒，無數次農民起義及統治者血腥的屠殺……完全予以掩蓋了。其次，一切封建秩序得到毫無條件的讚揚（家訓、族規、保約……），而一切專制淫威、窮奢極慾、焚書坑儒，男盜女娼，以至烝母、盜嫂、宮女、變童、男子腐刑、女子纏足、父子兄弟妻妾相砍殺等封建統治階級的醜惡則完全隱諱了。甚至「在另外一處還說：『國家建設的基層在鄉社，因之我們中國國體雖久為君主，而民治的精神實貫注於民間。』（頁三六）原來中國數千年來的封建社會的人民已經得到廣泛的民主（普及鄉社不

（可不謂廣泛矣），孫中山先生還要鬧什麼民權主義，豈不成爲無理取鬧！蓋此即所以「中國之命運」不得不作之理由也歟？

### （五）

我們要問：究竟爲什麼「中國之命運」的作者對於中國封建文化以及中國的封建秩序有如此的深情厚意呢？爲什麼在中國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的陣在偏偏來「發思古之幽情」呢？關於這個問題，馬克思在論「英國在印度的統治」裏面就已經答覆得很清楚：

「這些閉關自守的村社，無論其怎樣純良，它們始終是東方專制政體的穩固基礎，它們使我們的理智拘泥於最狹隘的範圍內，把理智變成迷信底馴服工具，使它們服從傳統慣例，使它不發生影響，使它不能努力於歷史上的活動。」

迷信，馴服。愚昧，安分，是專制政治下人民最好的德性，而「傳統慣例」就是專制政治下最好的文化，這就是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者所以高唱「中國固有文化」的基本原因了。

所謂「中國固有文化」，實質上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礎上以中國封建文化改裝了的法西斯主義。在血統上應該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與東條法西斯匪幫所養出來的一個宗支。不過由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這個特點，在中國化。同時，有時也不免帶着一副「捉襟見肘」的可憐相。

我們且把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和這一個中國化的法西斯比較一下吧：

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是以「反赤化」、「反對縱容赤化」爲理由來進行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而中國化的法西斯則以「使中國的文化陷於支離破碎的風氣」爲理由來反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

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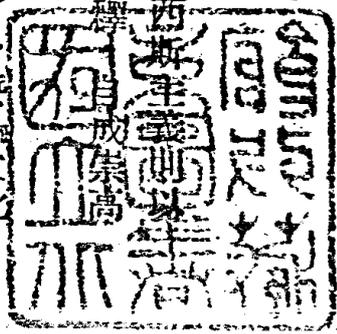
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用「亞利安種族至上」來蔑視其他國家和民族，而中國化的法西斯主義則用「中國固有文化至上」或說「中國固有的人生哲學經孔子的創導，孟子的闡揚，漢儒的訓釋的體系，比之世界任何派別哲學有過之無不及」（頁六九）來代替「種族優越論」了。

不過，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是向世界發動了侵略戰爭的，而中國的法西斯主義只好靠了什麼「文化融和」來代替「武力侵略」了。這是表現了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動派的阿Q精神。

不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公開的宣佈了其法西斯主義的「哲學」、政綱，而中國化的法西斯主義雖然有時替希墨二公捧捧場，而有時就不敢明目張胆的宣佈自己爲法西斯主義，只能以「中國固有文化」僞裝偷運了。這是表現了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軟弱與胆怯。

中國抗戰的六年是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六年，同時中國在全世界人類反對法西斯侵略戰爭中，又是簽字於華盛頓公約的同盟國家的一員。居今日而談中國的文化：只能是人民大眾反法西斯主義的文化、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文化。這種文化裏面不能有絲毫法西斯的成分，因爲我們的戰爭是反法西斯的戰爭；同時也不能有絲毫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成分，因爲這個戰爭正是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合作的戰爭，並且在戰後還要合作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世界。

在今日的中國文化中如果加以絲毫法西斯主義的臭味，——不論如何僞裝，那末這種文化必爲日寇所歡迎，觀之同盟社對於「中國之命運」已經稱讚爲「其論述之方向，是沒有錯誤的；但由日本觀之，這只是重複了已爲「帝國」聲明說盡了的大東亞新秩序論，迎合太亞細亞主義，抄襲汪精衛之「奔建國論。」（七月十三日同盟社電）由此可見，在中國而想建立法西斯主義，其最後結果必至走入投降的前途。



對付爲了中國的命運，爲了民族的前途，我們堅決反對這種以「中國固有文化」僞裝了的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文化；我們並應號召全國人民反對這種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文化，有了這種文化中國就會羸弱。

(一九四三年八月)



評「中國之命運」

編輯者 解放社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總分店 邯鄲·冀中

分店

邯鄲 邢台  
長治 辛集  
安國 鄭州  
河間 石家莊  
陽泉 忻縣  
榆次 張家口

一九四九年二月再版

( 2 ) 10,001—20,000

A 05 93



基本定價二十一元

500 V